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19年7月刊·第7期（总第34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黄坤明：在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化和旅游部实施《曲艺传承发展计划》 扶持曲艺开展驻场演出

■ “大系”平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简称使用规范
神话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

■ 学术视野

朝戈金：“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
中国古代海洋观念的转变与浙江海港的发展

■ 文化实践

重访“张库大道”——深挖草原丝路的民间文化遗存

目 录

■ 思想前沿

- 黄坤明：在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
文化和旅游部实施《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扶持曲艺开展驻场演出..7

■ “大系”平台

-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简称使用规范.....8
神话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12

· 各地推进动态 ·

-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山东卷》编纂工作启动会在山东枣庄
召开..... 24
“民间文学大系·福建卷”（故事、歌谣、谜语）分卷编辑工作推进
会召开..... 27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下卷》编纂工作会在鲁山
召开..... 28

■ 学术视野

-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朝戈金）.....29
· 论文推介 ·
《中国古代海洋观念的转变与浙江海港的发展——浙江海丝文化
考察调研报告》（毕旭玲）..... 34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理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编辑人员

覃奕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号院32号楼B307

投稿邮箱

mjwydt2016@163.com

电 话

010-59759244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2019年8月

■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稳步推进..... 41
- 中国民协与广岛大学初步达成学术交流合作意向..... 44
- “中国民间文学前沿话题”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召开..... 45
- 重访“张库大道”——深挖草原丝路的民间文化遗存..... 48
- 潘鲁生：悼念冯元蔚先生..... 53
- 众专家为雷公山节庆文化传承发展献良方..... 57
- “砖雕艺术中青年人才高研班”圆满结业..... 59

· 国际信息 ·

- “非遗保护能力建设”暑校活动举办..... 60
- 中国“匠人精神”传誉马耳他..... 61
- 第43届世遗大会“中国元素”成亮点..... 62
- 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庆祝成立104周年..... 62

思想前沿

黄坤明：在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祖国华诞、共享伟大荣光的浓厚氛围里，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成立 7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光荣历史和重要贡献，对做好新时代文联作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抓好贯彻落实，不断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在此，我谨向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 7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今天座谈会的各位作家、艺术家，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 70 周年，就是要在凝视出发点中重温我们的初心，在回望来时路中铭记我们的使命。1949 年 7 月 2 日，迎着全国解放的曙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7 月 19 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胜利闭幕，全国文联正式成立，7 月 23 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诞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进步文艺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民呼声作出的科学决策，翻开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崭新一页。从诞生的那天起，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热情讴歌新时代、新征程，走过了 70 年很不平凡的光辉历程。

70 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我们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植根中华文化沃土，聚焦人民群众

期待，鲜明提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重大方针，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热爱，对艺术理想的执着追求，在走进人民中提升境界，在深入生活中开展创作，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厚底蕴和无限前景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倾心投入、倾力创作，为人民奉献了一大批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的优秀作品。不同文艺领域、不同艺术门类千帆竞发、争奇斗妍，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了一大批反映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精品力作。像《东方红》《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作品，以高昂的革命精神、英雄主义给人以力量；像《谁是最可爱的人》《离开雷锋的日子》《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为全社会带来精神的洗礼；像《创业史》《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激励了人民群众的拼搏奋斗；像《茶馆》《渴望》等作品，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时代的变迁；像电视剧《红楼梦》、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充分彰显了传统之美、文化之美；像《歌唱祖国》《乡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旋律。无论是在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还是在大潮奔涌的改革年代，正是有了这些作品，才高擎了精神的火炬，点亮了人生的理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向前。

7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立德修身、崇德尚艺，涌现出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在与新中国同呼吸、共成长的进程中，广大作家艺术家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心怀祖国、根系人民，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在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丰碑上镌刻下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像世所公认的文坛泰斗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像人民喜爱的艺术大师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常香玉，像去年获评的“改革先锋”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蒋子龙、谢晋、路遥，还有一大批在新时代潜心创作、崭露头角的佼佼者。他们以坚定的信仰追求、卓越的艺术创造，绘就时代华彩、奏响时代强音，以

高尚的道德操守、独特的人格魅力，引领社会风尚、赢得人民热爱。

70年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了党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认真学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坚持思想政治引领，自觉筑牢党联系文艺界的桥梁，拉紧党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纽带，最广泛团结凝聚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特别是文联、作协深化改革以来，在组织“深扎”活动、开展“四力”教育、文艺志愿服务、团结联系新文艺群体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展现出新风貌新作为。作为作家艺术家自己的组织，文联、作协与文艺工作者热诚交朋友、热情搞服务、热心解难事，为作家艺术家成长成才搭桥铺路，为大家切磋交流提供平台，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老艺术家谈及自己艺术生涯的时候，都无不以当年加入文联各文艺家协会、加入作协感到光荣和自豪。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时代提出新要求。在新的征程上，文艺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天地广阔，文联、作协大有可为。在这里，我谈几点希望与大家共勉。

第一，举精神之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新时代文艺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之旗、精神之旗。要把抓好这一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切实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十分关心、格外厚爱，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十九大以来先后给内蒙古乌兰牧骑队员、老艺术家牛犇、中央美院老教授等写信回信，亲切看望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文艺界代表，围绕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具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把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真挚人民情怀、自觉历史担当，体现到创作实践之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上，用艺术的方式、优秀的作品展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转化为神州大地的生动实践。

第二，铸时代之魂，用文艺凝聚起新时代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新中国 70 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文艺总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激荡起不竭不息的精神力量。《暴风骤雨》《上甘岭》《焦裕禄》，激励了人们依靠艰苦奋斗、永远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冲天干劲；《二十年后再相会》《春天的故事》《我的中国心》，激起了中华儿女投身改革开放、追求幸福生活的巨大热情；《红海行动》《战狼二》《流浪地球》，激发了奋进新时代、创造新业绩的自觉自信。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追梦圆梦的好时代，是当代中国从容自信、不断为世界作出新贡献的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历史的剧中人。希望大家对这个时代珍惜珍视、用心动情，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用自己的文艺创造反映历史巨变、描绘精神图谱，为新时代中国破浪前行、为亿万人民创新创造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第三，怀赤子之心，在扎根人民、融入人民中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对大家说，“你们都是人民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有同感，文艺创作的源泉在人民的实践中，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在人民的口碑里，文艺工作者的价值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扎根戈壁、草原，六十年如一日，围绕农牧民创作、为农牧民放歌，成为北国边疆深受喜爱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前些天刚刚去世的著名画家刘文西老先生，半生

青山、半生黄土，先后百余次到陕北乡下，与老百姓拉家常、交朋友，他为陕北沟门大队一位老汉画像的作品《沟里人》，十分传神。这充分说明，艺术的感染力离不开生活的浸染和对群众的感情。希望大家进一步坚定人民立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结合正在开展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创作生产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奉献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第四，树凌云之志，不懈攀登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高峰。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创作的过程就是“立言”的过程，同时也是“立德”、“立功”的过程。每一个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都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作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韧，追求卓越、精益求精，而不是把作品当成商品甚至一次性的“快消品”。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创作代表作《铁皮鼓》的过程中，曾经为小说的开头第一句话绞尽脑汁、冥思苦想，长达3年多时间。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脚步遍及陕北乡村城镇，多次到弟弟工作的铜川鸭口煤矿体验生活，大量阅读了1975年到1985年的中央各大报，光剪报和笔记就做了几箱子。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攀登文艺高峰没有捷径可走，要树立远大志向，更要付出艰辛努力。与路遥创作的那个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创作条件和环境要好得多，更要增强迈向高原、攀登高峰的定力和勇气。希望大家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坚定文化自信，植根中国大地，大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一步突出文艺创作的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进一步发挥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导向作用，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要把创新贯穿文艺创作生产的全过程，大力拓展文艺题材、内容、形式、手法，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介，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

第五，领风气之先，自觉做明大德、立大德的灵魂工程师。文艺工作者是社会风尚的风向标，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大艺必有大德，大德成就大艺。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蓄须明志，宁可卖房度日，也决不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登台演出，保持了崇高的道德节操。豫剧大师常香玉为支持抗美援朝，短短半年时间巡回义演170多场，用演出收入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战斗机，成就了我国戏剧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崇德

和尚艺、修德和修艺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些年，有的文艺从业者失德败德甚至触犯法律，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名誉、耽误了艺术生命，也损害了文艺界的形象，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引以为鉴。希望大家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始终牢记肩头的社会责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必修课，不断修炼为人、做事、从艺的品行素养。要在文艺界大力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引导文艺工作者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是党领导的文艺界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当今时代，文艺领域发生深刻变化，文艺新业态、新样式不断呈现，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大量涌现，团结引领文艺界的任务愈加繁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文联作协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文联、作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文联作协的组织优势和职能作用，加强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推动各级文联作协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要按照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求，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思想政治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不断增强组织活力、向心力、吸引力和行业影响力。要着眼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基层文联作协履职能力，使基层文联作协在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基层乡土文艺人才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真正把文联作协建设成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群团组织，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

回望风雨兼程的70年，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用满腔赤诚、一身才华，书写了属于自己、更属于党和人民的光荣与辉煌。展望凝结着伟大梦想的下一个70年，我们在新时代的号角中启程，矢志不渝、充满信心、充满豪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守正创新，不断谱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文艺新篇章！

（《中国艺术报》2019年7月17日）

文化和旅游部实施《曲艺传承发展计划》 扶持曲艺开展驻场演出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出台的《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明确，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重点，扶持曲艺开展驻场演出，鼓励在曲艺项目丰富、观众氛围浓厚的地方探索挂牌设立“非遗曲艺书场”，探索设立曲艺电视书场、广播书场和网络书场；扶持马街书会、胡集书会等民间曲艺展示交易集市的发展，鼓励和引导曲艺项目进入城市和乡村旅游演艺市场。

目前，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曲艺类项目共计 127 个大项。推动曲艺传承发展，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繁荣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作进行专项部署。

计划提出，曲艺传承发展要坚持以融入现代生活、弘扬时代价值为导向，坚持以说唱表演作为基本实践形式，坚持以传承人群为核心，坚持整体性保护的理念等工作原则。力争通过本计划的实施，到 2025 年，曲艺的整体活力显著增强，存续状态持续好转，曲种特色更加鲜明，传承队伍有效扩大，受众群体明显增加，曲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得到充分发挥。

计划提出了开展调查评估、完善档案信息，加强项目管理、夯实保护责任，做好项目记录、加强成果利用，扩大传承队伍、提高传承能力，推出优秀作品、满足人民需求，扶持曲艺演出、增加实践频次，组织展演活动、繁荣曲艺市场，开展曲艺普及、扩大曲艺受众，支持学术研究、加强专业指导 9 项主要任务，并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明确职责、统筹力量、落实资金，加强计划的工作部署和实施保障。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积极研究制定分门类的非遗保护政策。《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是继传统戏剧、传统工艺的又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政策文件。

（新华网 2019 年 7 月 29 日）

“大系”平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简称使用规范

(试 行)

参照中宣部相关文件文本，并结合出版编辑规则的要求，现对实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中涉及的正式名称及其简称列出使用规范。

以下简称的使用规范，适用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各分卷编纂工作，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及社会宣传推广活动相关的文件、媒体报道、会议纪要、学术论文、文集、通讯，以及会标、会议手册、会议材料等处。

一、组织机构、科研单位相关简称

(一) 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办、国办〔2017〕5号)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如果行文中出现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应使用全称；特别是在正式文件中，须使用全称。在行文中使用超过三次，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以下简称中办、国办)。

2.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后文需要使用简称时标注：(以下简称《意见》)。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如果行文中出现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应使用全称；特别是在正式文件中，须使用全称。在行文中使用超过三次，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以下简称传承发展工程)。

(二)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分别简称为：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中国社科院、中国艺研院。各地同类组织机构参照此简化单位名称。为了避免歧义，大学、学院一般不用简称。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协，在行文中同时出现时可简称为：各省区市民协及新疆兵团民协；当对应《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各省分卷及编委会使用时，可简称为：各省级民协。

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简称

如果行文中出现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应使用全称；特别是在正式文件中，须使用全称。在行文中使用超过三次，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

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简称

作为书库名称使用时须加书名号，且后面不应接续出现“出版工程”字样；后文使用简称时标注：（以下简称《大系》）。

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组织机构正式名称及简称

（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

各省区市及新疆兵团的大系出版工程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全称应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省（区市或新疆兵团）工作领导小组。后文使用简称时标注：[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省（区市或新疆兵团）领导小组]。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河南省工作领导小组）。

（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

各省区市及新疆兵团的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正式全称应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省（区市或新疆兵团）学术委员会。后文使用简称时标注：[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省（区市或新疆兵团）学术委员会]。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河南省学术委员会）。

（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不得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编委会。

（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专家组

作为十二个专家组的统称时，简称：大系出版工程专家组。

具体到某个专家组时，简称：大系出版工程“××（体裁或民间文学理论）”专家组，或“××（体裁或民间文学理论）”组。

（五）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协调工作组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协调组。

（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出版及版权工作组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出版及版权组。

（七）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数据库工作组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数据库工作组。

（八）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基础资料数据库

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数据库。

（九）各分卷编委会的名称及简称规范

各省区市及新疆兵团分卷（即各省级分卷）的编委会，正式全称应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体裁）·××（省区市或新疆兵团）卷·××分卷》编委会。简称：××（省区市或新疆兵团）××（体裁）卷编委会；或简称：××（省区市或新疆兵团）××（体裁，此处不加“卷”字）××分卷编委会。例：山东说唱卷编委会；河南故事平顶山分卷编委会；黑龙江史诗伊玛堪分卷编委会。行文中，应在正式名称后以括号内容的格式进行标注。

五、民间文学史上的术语使用规范

（一）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可简称为：中国民研会、民研会。文中首次使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需加括号标注：（1987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或（中国民协前身）。

（二）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

民间文艺研究会文件《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第 808 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简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或“三套集成”。

1986 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并列为“十套文艺集成（志）”，或称“十套集成（志）”。

历史上与此相关的术语比较多，用法也比较多样，列为参考：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1984 年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出版规划》（简称《规划》），1985 年 6 月制定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1987 年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

《中国民间文学普查集成》

《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

（三）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2010 年 12 月启动）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简称：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简称：文学遗产数据库。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简称：《总目》。

行文中应在正式名称后以括号内容的格式进行标注。

六、本《工作手册》¹中部分民间文学体裁分类相关简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简称《工作手册》。

出于行文方便、整齐的考虑，本《工作手册》中“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仅在本《工作手册》中统一省略“民间”二

¹ “本《工作手册》”指即将印发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

字。例如：“民间传说”专家组，简称传说组；民间传说卷，作为一类卷本的统称时简称“传说卷”。

本《工作手册》中“民间文学理论”编辑专家组，简称理论组；民间文学理论卷，作为一类卷本的统称时简称“理论卷”。

本第七条中的简称用法，不适用于大系出版工程其他工作。如会议标题中涉及体裁、分类时，仍按第四条的要求执行。例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文学理论”专家组工作会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民间故事卷”编纂工作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四川卷》编纂工作推进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平顶山分卷》调研座谈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编委会工作会议；等等。

七、说明

（一）关于“（以下简称）”字样：如果是（以下简称“××”），则后文使用此简称时要加双引号；如果是（以下简称××），则后文使用此简称时不加双引号。

（二）本使用规范的解释权归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
2019年8月6日

神话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

编者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汇集口头文本、身体文本、视觉文本和仪式文本的全景式的记录优势和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叙事策略，为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奉献当代学人

智慧与人文理念。梳理和辨析各类民间文学的学术界定，审度和阐释分类与编纂原则，研究和把握编纂体例及作品选材标准，总结和交流地方实践经验与调研成果，既出于推动各地编纂工作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工作的重要环节。为此，中国民协与《文艺报》合作，将陆续刊发相关的专版文章。以下四篇文章刊发于《文艺报》（2019年7月26日第6版），由于版面有限，报纸登载的是删节版，现将神话组专家及地方卷编纂工作负责人的相关文章呈录如下，供参考交流。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与“河南卷”印象

叶舒宪¹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示范卷的“云南卷”与“河南卷”（以下简称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即将出版问世，我谨代表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表示热烈祝贺，并谈一点感想。

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之所以能够在全国31省区中脱颖而出，首批亮相，主因是其研究基础雄厚，调研和整理工作积累成果丰富。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这两个省率先出成果，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核心区的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给日后各省市自治区卷的全面铺开，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和实际操作方面的前车之鉴。

从这两个省卷的编纂体例看，二者截然不同。主要的差异在于对神话的分类方面。河南神话卷是按照神话人物来分类编排的，这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以下简称《工作手册》）的神话分类范式明显不同，也就是没有按照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和其他这五大类来编排内容。而是按照上卷：1 盘古神话，2 伏羲女娲神话，3 神农神话，4 有巢氏、燧人氏神话；下卷：1 黄帝神话群，2 嫫祖神话群，3 仓颉神话群，4 岐伯与祝融神话，5 颛顼与帝喾神话，6 尧与舜神话群，7 大禹神话群，这样总共十余位神话主人公作为分类项，在每个项下面再按照地域分布给予细分。如上卷的第2类伏羲女娲神话群下，再细分为11个地域神话群：

（一）淮阳伏羲女娲神话群（70则）

¹叶舒宪，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组长，中国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

- (二) 西华伏羲女娲神话群 (49 则)
- (三) 新密伏羲女娲神话群 (25 则)
- (四) 济源伏羲女娲神话群 (20 则)
- (五) 遂平伏羲女娲神话群 (15 则)
- (六) 汝州伏羲女娲神话群 (15 则)
- (七) 沁阳伏羲女娲神话群 (5 则)
- (八) 孟津巩义伏羲女娲神话群 (7 则)
- (九) 荥阳伏羲女娲神话群 (8 则)
- (十) 淇县伏羲女娲神话群 (11 则)
- (十一) 其他地区伏羲女娲神话 (76 则)

又如下卷的第 1 类黄帝神话群之下，共收录 167 则，再细分为 5 个地域神话群：

- (一) 新郑黄帝神话群 (77 则)
- (二) 新密黄帝神话群 (54 则)
- (三) 灵宝黄帝神话群 (8 则)
- (四) 济源黄帝神话群 (6 则)
- (五) 其他地区黄帝神话群 (20 则)

这样的分类根据神话人物和地域性集群情况，属于因地制宜，能够突出体现各类神话传说在民间社会的空间分布状况。如果要问为什么河南省的民间传承神话集群现象如此突出？一个现成的解释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地理原型区，是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建都的文化统治中心所在，正如中国成语所说的“问鼎中原”和“得中原者得天下”。本地民间神话特别突出对华夏国家三皇五帝神话历史谱系的记忆，这完全是特殊的历史积淀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特质所在。河南神话卷以三皇五帝神话人物谱系为分类标准，这也是以往调研工作积累的体现。从上世纪 80 年代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团队到各地采风，广泛收集民间神话，到刚出版不久的四卷本《中原神话通鉴》，河南以县为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硕果累累。本卷采用以往的神话人物分类方式，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省卷本的特例来看待，不宜作为示范加以推广。这个意见也是十分中肯的，考

考虑到全国各省卷如何统一的问题，还是以严格按照《工作手册》分类编纂的云南神话卷作为示范。

云南神话卷在 100 多万字篇幅里，收录了该省境内 24 个民族的口传神话，计有阿昌、白、布朗、布依、傣、德昂、独龙、哈尼、回、基诺、景颇、拉祜、傈僳、苗、纳西、怒、普米、水、佤、瑶、彝、侗、藏、壮等民族。从其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口传文学传统的汪洋大海，如此繁荣的现象不是任何个人性的文人创作所能比拟的。本卷的出版，可以让云南省多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神话故事这个易于普及的传播平台，更加方便地传播开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分享，让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源库和智慧库作用得以有效发挥。日后将西南、西北和东北各省区的全部口传神话汇聚一体，必将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多民族神话的整体呈现，势必将对过去 100 多年来限于汉文古籍为主的“中国神话”观大大改观。这应是世界神话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和少数民族神话故事对应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文物。如铜鼓，这样一种流传两三千年的文物所体现的民族传统，与中原文明礼俗明显不同。铜鼓的地域分布，从成都平原的巴蜀地区，向南延伸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再向南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和马来半岛。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为什么如此青睐铜鼓，这一直是悬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心中的未解之谜。只要拜读云南鹤庆县壮族民间艺人王华青等人口述的神话故事《铜鼓老祖包登》，谜底就会顿时大白于天下：天地开辟之后的人类繁衍过快，引起天神担心。天神派恶龙来人间祸害，一只母虎带着仅存的一个男人逃亡他乡。他们在洪水中漂浮了 99 年，才得以上岸。从此二者相依为命，男人老死之前让母虎受孕。世间唯一的生物母虎，怀孕千年之后终于生下一只铜鼓，从中走出新的人类。他一生出就变为巨人，击打铜鼓一下，就生出一个人来，从此大地上又有了人烟。后人不忘祖先恩德，把铜鼓尊为世界的守护神。每个村里都要祭祀铜鼓和祖先。壮族神话《铜鼓老祖包登》就这样生动地呈现出南方民族广泛传承的铜鼓文化的“底牌”，对千千万万村落中至今还在传承的铜鼓仪礼，确实有一种再语境化的激活作用。仅此一例，就可以大致说明多民族神话遗产的学术意义和文化再造功能。

同样的道理，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只记录下华夏共祖黄帝有个雅号叫“有

熊”，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只要翻阅河南神话卷“新郑黄帝神话群”的首篇《有熊氏的来历》，读者就好像找到黄帝号有熊之谜的谜底一般。这就是民间口传神话的补史之缺的重要作用。

精心梳理神话资源 深入发掘传统文化

王宪昭¹

大系出版工程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其中，“神话卷”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门类，如何全面采集、科学梳理、系统呈现，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要正确认识神话采集整理的意义。神话发轫于人类史前时代，是人类没有出现文字之前就产生的文化作品。它不仅保留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最早记忆，而且通过后世不断的口耳相传得以丰富和发展。从人类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演变看，文字作为记录工具出现较晚，而作为口头传统的神话却承担着人类更早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口头传统和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神话作为无数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时间的冲刷而流传至今，许多优秀神话中都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这些优秀神话或者说神话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民族精神，很好地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当然，大系出版工程为神话单独设立卷本，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科学态度。在以往关于中国神话的鉴赏、分析和研究中，并没有给予神话科学的定位。不少人认为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神话支离破碎，没有形成像希腊等西方国家那样的神话体系，甚至还有人否认中国神话的存在，即使一些教学设计或公开出版物中也往往把神话列为民间文学或故事，认为神话的本质无非是凭借想象或幻想编造出来的“瞎话”“假话”，显然这些结论和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有史以来，不同地区、

¹王宪昭，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融合中积淀出的神话，有的被作为民族的根谱，有的被当作是生活的教科书，有的支撑着日常民俗，有的充当着民族团结的历史依据等，许多历史文化研究者把神话视为人类古老文明的百科全书。所以全面系统地采集整理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的神话，是全面审视与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性任务。

二是准确把握神话编纂的关键环节。任何一项工程都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许多环节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对于大系出版工程的编纂而言，需要把握好神话的定位、采集、分类、呈现等几个关键环节。目前学术界对神话的定义有不同的界定，有的注重神话的创作方法，有的注重其文化内涵，有的注重其社会功能，并且许多学科诸如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对神话作出相应的描述。总体上看，这也反映出神话兼具文学、历史、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特色。如果从民间的角度出发，不同的讲述人和受众也会对神话有不同的认识。因此，神话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神话主要指的是人类史前文明时代创造的作品；而广义的神话既包括史前文明的时代创造的作品，也包括后世加工、改造或者创造的作品。根据当今神话资源辑录和神话传承的实际情况，神话采录的范围以广义为主比较合理，主要界定为民间曾经流传或目前仍在讲述的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神圣动植物及其事迹或活动的叙事。

鉴于神话产生、传承与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其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在采集过程中应坚持科学的甄别原则，从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呈现与应用着眼，最大程度选择那些内容上健康向上、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神话作品，特别是做好对此前全国范围内民间文艺工作者已经完成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神话部分的查遗补漏，尽量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神话作品，也兼顾散体神话、韵体神话和散韵结合体神话的不同样式，力求客观展现出神话创作与传承的真实样态。同时，对采录者、整理者、编纂者等实际工作者要做好田野调查方法、神话著录规范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使他们能够采用目前日益普及的信息技术新手段，有效采集神话传承中的语境资料。有些重点神话作品力求附加相关图片资料，必要时还可以制作相应的录音、视频等，最大限度地充实神话生态的相关信息。在神话采集中，既要尊重讲述人，尊重语境，尊重原貌，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秉持服务人类文化发展的科学态度，既不复古泥古，又不简单否定，切实保护和挖掘好中华民族最基本最优秀原生态的神话资源。

无论是神话采集、神话梳理还是神话的呈现，都会涉及神话类型的界定问题，这也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展现各地神话资源的重要环节。一般而言，不同地区神话传承和传播情况会有差异性，形成的神话类型也不尽相同，这导致目前学术界对神话类型的划分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各地神话卷中神话类型的呈现方式可以按照存异求同或因地制宜的原则，参考如下一些类型，即诸神起源神话、世界与万物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动植物起源神话、解释自然现象神话、解释社会现象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婚姻爱情神话、灾难战争神话、其他类型神话等，上述 10 类可以作为大的神话类型。至于人们在神话阅读中常见的诸如文化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治水神话、射日神话等具体类型名称可以归入上述类型，也可以根据神话数量或神话重要性等实际情况，通过单列的方式的编辑呈现。

三是注重神话资源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卷》的编纂而言，需要统筹兼顾，做好文化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地方政府、民间艺人、社会志愿者等多部门多层次的通力协作与工作互动，秉持勇于担当之心，精心打造中华民族神话资源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对神话资源的完整性而言，一部完整的神话文本应包括正文与辅助信息两项内容。神话文本的正文要力求内容完整，文从字顺，神话演述中的方言土语、风土习俗、特殊用语等尽量保留原貌，晦涩难懂之处可采取注释形式加以解释。作品辅助信息包括“讲述者”“采录整理者”“采集时间”“采集地点”“流传地区”“文本来源”等多项内容，其中，每一条信息都是神话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尽可能的细化与精准表述，为今后使用者提供信息支持，如讲述人基本信息一般要包括民族、性别、出生年月、职业、文化程度及其他相关信息，对于一些重要的讲述人还可以设立个人小传，对其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传承特点等做出必要的记录。这种信息辑录也同样适用于翻译者、采录者、整理者等。对于“流传地区”，应采用“省（市、自治区），市（地区、自治州），县（市、区、旗、自然保护区及经济开发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格式表述，原文行政区域表述不完整或出现名称变化时，要做出相应补充说明。

当今信息技术与智库建设的迅速发展，不仅为神话资源的开发、传播与应用提供了新

的契机与挑战，更为中华民族神话资源的数据整合与系统化提供了条件。各地文化部门无论是从传统文化资源普查的需要，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角度，都可以通过这次神话资源的再调查、再梳理和编纂出版，全面审视鉴别本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而中国民协组织的全国范围内的神话资源整合，则更加有利于深入发掘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链，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振兴进程中，汲取古老智慧、弘扬中华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神话：云南各民族口述历史的精彩画卷

杨海涛¹

云南有 26 个民族，他们交错聚居于这块山峰耸峙、江流奔腾、大小坝子星罗棋布的红土高原上，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文化土壤中，云南各民族神话得以存在、流传和发展。可以说，世界上主要的神话类型都可以在云南各民族神话中找到实例，而且云南各民族神话还保留着它们特有的古朴性、完整性，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云南各民族神话的发展过程较复杂，很多作品都在民间以散文体形式流传，但同时也有大量作品融入到后期的长篇韵文创世史诗之中，傣族、纳西族、彝族的神话甚至还被收录到民族传统典籍里。云南许多民族的散文体形式神话总是与韵文体的创世史诗并行不悖。只是前者主要在民间流传，篇幅相对较短，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讲述；后者却成为整部创世史诗中很重要的部分，多由祭司和歌手在较庄重的场合演唱。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按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结合云南各民族神话作品实际进行选编。本卷选编阿昌族、白族、布朗族等 23 个民族 300 余篇神话作品。主要选自以下几个方面：民间故事家、民间文学研究者采录的，尚未发表的民间文学资料；1984 年以来全省民间文学普查中直接采录于民间，各县编辑的尚未发表的县卷资料本；少数作品选自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开展的 3 次民间文学调查工作中采录的资料；为保持云南各民族神话体系的

¹杨海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主编，云南省民协主席。

完整性、全面性，还有部分选自 1983 年以来出版的各类民间故事集。

云南各民族神话按内容划分主要包括：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 4 类。

在云南民族众多的诸神神话中，主人翁多以男性为主，如纳西族的丁巴什罗、崇热丽恩、猎神高愣趣、哈尼族天神俄玛、布朗族的顾米亚、景颇族的宁贯娃等等，都显示着男性创造天地、战胜艰险、造福人类的伟力。我们从这些神话中，可以认识到云南各个民族在阶级社会前的神人英雄时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从蒙昧初开到文化创造和早期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漫长历程。诸神神话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古代英雄的创业史。这个时期，云南各民族的认识方向逐渐从自然转向自身，即从认识自然、审视自然不断上升到认识他们自身，所以诸神神话中有明显的人类自身认识和自身审美的特点。

而云南文化英雄神话中的诸神，多是神武超群、德智不凡的半神半人，有些甚至是神的后代。他们的行动和力量使某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得以初创与发展，为氏族、部落带来了福祉。如“取火”英雄，“找谷种”英雄，还有那些为人间除妖灭害，给人们带来太平的如普米族“冲格萨”、藏族“格萨尔”式的英雄们。在此类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性英雄意识逐步由集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进，由纯属自然幻想意识向人世社会发展意识渐进。这种由意识渐进到行为产生的神性英雄，以拉祜族神话《札努札别》为代表性。札努札别突破传统观念，他责备了不劳动而享受祭礼的天神厄莎，并破天荒地说出了人与工具结合才能创造财富的客观真理。札努札别得罪了天神，惨遭陷害而死。这则神话使我们看到古代初民对神的敬畏与叛逆。这一类英雄虽不是胜利者，不是行为胜利的英雄，但他是古代发现并捍卫真理而死的英雄。

云南少数民族开天辟地神话同样丰富，如彝族《开天辟地》、白族《开天辟地》、哈尼族《神话的古今》、傣族《英叭开天辟地》、傈僳族《天地和人的来历》、纳西族《地是怎么缩小的》《人类迁徙记》、景颇族《开天辟地》、布依族《力嘎撑天》等都是重点讲述开天辟地过程的神话。云南各民族开天辟地神话按内容可分为变化生成说、神造天地说两大类。而在神造开天辟地的神话中，不只是形象地解释了天地形成的过程，还生动地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在神话产生与发展时期的劳动情形、劳动工具和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充

分肯定了劳动创造的丰功伟绩，给人以宏伟、壮丽、震撼人心的审美感受。

人类起源神话主要讲述人类为何产生，以及解释氏族、部落起源以及人类的重新繁衍。白族有《氏族来源》，布朗族有《削木成人》《帕雅英、帕雅捧、帕雅天造人》，独龙族有《雪山之神》，哈尼族有《俄孔八森造人》《俄妥努筑与仲墨依》，回族有《怒海船》，基诺族有《玛黑与玛妞》，怒族有《腊普与亚妞》，佤族有《司岗里》，瑶族有《伏羲兄妹》，彝族有《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壮族有《从宗爷爷造人烟》等。这些神话除了极少部分认为人是由某种物质变成的外，绝大部分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

神造人的起源神话在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较多，把神造人的过程完全描写成凡人的行动，其中充满了挫折和失败，艰辛和痛苦，显得悲壮而崇高。这种造人的描述并没有多少神的威力，而是靠各个民族自身的智慧和追求真理，不怕失败的精神。神造人的神话，虽然没有能够揭示人类起源的真实原因，但它们并没有贬低人类地位和价值，相反，它们像一面镜子，让各民族看到了自己生命发展历程的艰辛和神圣，让人们更加珍视生命。

云南文化起源神话，以取火、用火、谷物获取与种植、房屋建筑和文字的发明为主要内容，如阿昌族《盐婆桑姑尼》、傣族《贝叶信》《谷魂奶奶》、德昂族《谷种起源》、独龙族《创火人》、哈尼族《三兄弟找文字》、普米族《青蛙教人喝智慧水》、怒族《女始祖》等。云南各民族取火神话各式各样，反映了人们对火的一种深沉渴望。而在云南众多稻谷起源神话中，大多说谷种来自天上，把谷种视为神圣之物，神赐之物。拉祜族《卡腊节的传说》中讲述谷种来源却与众不同，它讲的是，一位叫卡腊的猎人从鸟雀啄食草籽的观察中受启发而得来了植物的种籽。籽种来源从神坛走向人间，说明人类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神话隐约地向我们揭示出人类文明逐步告别童年的过程。农业的兴起与发达，使原始人有了更好的生活保障，因此，他们把早期对农业有突出贡献的人视为神人。拉祜族苦聪人还有一个祭祀卡腊的节日，叫“卡腊节”。

在对文字起源的探索中，云南各民族的神话里，除了归之于天，归之于神外，也有归之于人。只不过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是各民族具有一定神性的著名的文化英雄。比如汉族历史上传说的伏羲、女娲、黄帝等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文化英雄。云南神话中彝族有两兄妹，哥哥叫阿苏拉吉，妹妹叫阿格。他们一同上山放羊，在神鸟的启发下，创造了彝文。在纳

西族的神话中，他们认为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是其教祖丁巴什罗创造的。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和地域构成的原因，云南各民族神话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二是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歌诗乐舞的审美活动。因为云南民族神话与传统文化的这种天然关系，使它们包含传统哲学、宗教、伦理、科技和文艺思想，具有各民族的自然史、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百科全书”性质和教化与审美等多种功能与价值。这些神话构筑成一个多姿多彩的神话世界。有学者称云南为“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确实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文化景观。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编纂手记

程建军¹

神话，是产生于原始社会而世代传承的口头语言艺术，是人类心理历程上一种特殊情结的语言反映，也是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宗丰厚的精神财富。尽管那些看似荒诞的带着天真幼稚幻想的神话中有许多至今仍未能揭示的谜底，但它仍不失为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学样式。神话是人类社会起源的口传历史，所以，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民俗、历史、宗教、科学、语言、文化艺术发生学的研究家们，都要到神话这座古老而又神圣的殿堂去寻根究底。作为口承文学的神话，它所蕴藏的深层的民俗文化积淀，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是一个永远解释不完的世界。在每个民族的神话中，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幻想和追求，给后人奠定了到达理想境界的基石，增强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动力。

中国神话早在先秦典籍《山海经》《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汉代和三国以后的《淮南子》《史记》《独异志》等古籍中也有许多片断的古典神话。中国神话中的主要内容大都可以在中原神话中找到，甚至连世界性的同母题神话，如“开辟创世神话”“洪水神话”“盗火神话”等，在中原地区也多有流传。

近几十年来，经过我们对中原民间流传的“活”神话的发掘和研究，中原神话完整的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弥补了中国汉族神话“零散”的缺憾。在中原神话中，我们可以清

¹程建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主编，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主席。

晰看到比较完整的神话体系和较为明晰的“神谱”脉络：盘古开天、三皇创世、五帝霸业、大禹治水，直到从天体神话中演绎出“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一切，为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以下简称河南神话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研究发现，中原神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呈集群式分布的显著特点，即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围绕一个神话人物，派生出许许多多神话故事。一个神话集群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除了自古而今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因素外，还将受到社会的、地理的以及世俗文化的影响。诸种因素聚结起来创造出一种适合此种神话繁衍滋生的土壤，一个适应民间信仰需要的神话集群就会产生，一位神话集群的中心人物——庇佑一方的神的形象也就被创造出来。被创造出来的这位“神”的神职，也为了适应当地人们的需要而不断地扩大或发生变化。如盘古的神职就不仅仅是开天辟地，他还要造人，还要负责人们日常生活中良好愿望的实现。

根据中原神话的这些特点，我们在大系出版工程“神话卷”编纂体例的大框架下，研究设计了河南神话卷“经纬交织、整体呈现”的编纂方案，即以盘古开天到大禹治水的神话人物为经，以点状分布的神话传播群为纬（反映到目录上为“神话人物谱系为纲，神话集群分布为目”），两条线纵横交织，将中原神话的丰富性整体呈现出来。通过对掌握资料的分析研究，我们将河南神话卷分为三卷编纂。卷一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伏羲、女娲、神农、有巢、燧人）；卷二从“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到大禹治水；卷三为其他诸神及天体自然神话。这个编辑思路，得到了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的认可。

在原有神话资料的使用和神话篇目的选择上，我们确立一个原则：以 20 世纪 80 年代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采录的篇目为科学性参照；以河南神话卷中所选神话篇目为入卷标准；以上世纪末“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县卷本中神话篇目为基础；以新近征集、采录的神话篇目为补充。

河南神话卷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上海“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传说、故事卷工作会议”以后正式启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编委会查阅“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等 223 册，从中提取神话资料 1490 余篇；从中国民协提供的数据库材料

中提取神话资料 308 篇；在近年来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出版的神话作品集中提取神话资料 290 篇；通过微信群新征集到了近 40 万字的神话资料。资料搜集阶段，共查阅了约 1000 万字的文字材料，从中提取了近 400 万字有编辑价值的作品。

查漏补缺是保证河南神话卷具备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重要环节。在本卷初稿基本形成时，河南神话卷编委会重点解决了神话集群流传地区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主要补录重点神话作品缺失的讲述者和采录者信息，恢复部分作品的口语化。主编亲自带领部分编卷人员，多次深入重点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及相关作品的近期采录，先后在汝州考察搜集了多篇伏羲女娲神话作品及其相关民俗资料，在孟津负图寺、淇县灵山寺等地重新采集了一些有关伏羲女娲、盘古等神话传说的图片资料。

2019 年 1 月 29 日，河南神话卷编委会完成了两卷的初稿汇编工作并提交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其中卷一收录神话作品 459 篇，卷二收录神话作品 456 篇。

2019 年 3 月 18 日，本卷的前言、图片及《河南省主要神话分布区域表》《河南省部分民间神话讲述者、采录者简介》《本卷方言检索表》《河南省部分民间神话作品书目（书影）》《河南省部分中原神话研究书目（书影）》等附录资料完成初稿并提交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各地推进会动态 ·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山东卷》编纂工作启动会 在山东枣庄召开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山东卷》（以下简称山东俗语卷）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民间俗语类 2019 年第二批省级编纂卷本之一。俗语作为民间文学大家庭中的特殊成员，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使用频繁、种类较多，并普遍存在、流传于民众生活之中。

7月14日，由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协、山东省民协主办，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枣庄市民协、山东省民俗学会承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山东卷》编纂工作启动会”在枣庄市召开。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邱运华，山东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原文史委主任刘德龙出席了会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大系出版工程“俗语”专家组组长林继富，济南大学教授、大系出版工程“俗语”专家组副组长张廷兴，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江苏卷》（以下简称江苏俗语卷）主编崔月明，中国文联出版社“俗语卷”责任编辑周劲松，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山东俗语卷主编张士闪，山东省文化馆原副馆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王丕琢等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张士闪在致辞中表示，俗语既是文化载体，也是文化本身，是地方文化神韵高度浓缩的表达，主动请缨担任山东俗语卷主编，不仅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还因为在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发现山东俗语研究的深厚积累与专家队伍的完备，相信依托山东省民协与山东省民俗学会这两条线的资源优势，有信心编好山东俗语卷。

刘德龙发言说，大系出版工程是一项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山东省以张士闪为首的各位同仁们主动请缨，勇于承担起山东俗语卷的编纂工作，这是迈出扎实关键的一步，希望各位同心协力切实完成好山东俗语卷的编纂工作。

林继富从“俗语卷”的编纂体例出发，具体阐释了民间俗语的概念、分类、编纂原则，并结合江苏俗语卷的审读经验，强调“歇后语与谜语”“俗短语与成语”“口彩语与歌谣”等分类问题的把控尺度，在搜集时，要确保信息的科学性，完善文本要素，均衡采集、突出特色，注明知识产权所有者与版权所有者信息，特别强调山东俗语卷编委会操作过程中需遵照“俗语卷”编纂体例要求，突出山东地方特色。

张廷兴总结了江苏俗语卷审稿方面的经验，结合大量的实例，提炼出江苏俗语卷中值得学习的亮点，认为其凡例和概述的撰写、内容的多样丰富、分类的科学规范、释义的广泛、异文的多变、字体的处理、组织力量等方面值得山东俗语卷学习和借鉴。同时，他还

提出两点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第一、释义表述还需更加精准；第二，分类困难，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大系出版工程“俗语”专家组联络员周灵颖转述“俗语”专家组副组长黄涛的书面建议，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俗语卷体例需按照最新修订版的体例要求来操作；第二，俗语卷新修订版的工作手册特意说明，一些浅显易懂的俗语没必要逐条释义，切忌从网上或者从别处辞书上照搬照抄，违反学术规范，在文字处理方面，释义内容应是带有老百姓地方文化特色的讲述，如果地方编委会对条目释义做了重新调整，只要符合老百姓的用语习惯和释义风格，讲述者署名可为编委某成员，但必须符合科学性和必要的内容讲究；第三，江苏俗语卷的不足之处也值得引起注意，比如其问题多的地方出现在与谚语、成语、古人诗文名言等其他语言种类的分，另一个问题是条目重复，俗语之间只有一字之差的，实质上为一个俗语，没必要逐条释义；第四，建议山东俗语卷编委会学习借鉴山曼先生的释义方法，或收录他的文本，但应处理好知识产权问题。

为了山东俗语卷的编纂工作高效有力的开展，学习江苏俗语示范卷的先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崔月明介绍说，江苏俗语卷启动很早，作为俗语卷编纂的先行者，编委会压力很大。为了避免后来者少走弯路，他认为操作层面上的“四个一定”很有必要分享：一定得做好培训工作；一定要明确专家队伍；一定要划阶段、安排好编纂工作进度表；一定要统一技术要求和编纂标准。此外，崔月明还结合具体例子谈了江苏俗语卷分类的做法与文本筛选工作、工作进程的阶段划分等。

周劲松从编辑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出发，详细地介绍了“书稿符合出版管理规定”“文稿来源”“文稿的编排”“注释标注”等四方面内容，并强调应避免涉及宗教、民族、低俗等相关问题的内容，文稿来源和图片信息要准确规范，避免著作权、版权纠纷，文稿编排需科学规范。

邱运华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表达了对各位编委的诚挚谢意，肯定了大家所做的贡献与努力，“俗语作为大系出版工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上，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没有做过，亦没有前人的工作经验可借鉴，但这也恰好说明俗语卷的编纂还留存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俗语学术研究成果与田野调查研究工作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力作用”。他说，

经验教训是一笔财富，能避免走很多弯路，鉴于专家组的指导意见、江苏俗语卷的经验介绍、出版社编辑的问题意识分析，他对山东俗语卷的编纂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第一，政治要求，设好标准，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政治敏感问题、民族及宗教问题，避免出现导向问题；第二，技术要求，做好技术培训、划阶段做好每一步工作安排；第三，学术要求，尊重学术规范，科学准确地做好俗语的释义；第四，突显特色，编纂团队应提炼地方文化精髓，彰显山东俗语特色，江苏俗语卷的做法可以借鉴，但不可模仿；第五，强调时间节点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引起高度重视，做好时间安排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高标准、严要求地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张慧霖）

“民间文学大系·福建卷”（故事、歌谣、谜语）分卷 编辑工作推进会召开

7月22日晚，“‘民间文学大系·福建卷’（故事、歌谣、谜语）分卷编辑工作推进会”在福州溪山温泉酒店召开。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曾章团、卢为峰、沈顺添、夏敏，南平市民协主席赵玉兰、龙岩市民协主席钟德彪、宁德市民协主席缪锦灼，以及来自九地市的大系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曾章团主持。

会上，夏敏传达了中国民协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民间故事卷编纂工作会”对编纂工作的相关要求。他强调，各地市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一是需重视选稿的重要性，每个文本务必交待背景上下文；二是需做好相关附录、附记工作，注释尽可能详细，以显示故事地域性；三是在下一步工作推进中，为避免劳动力分散，有“传说”示范卷编纂经验的原班人马需更多介入，确保责任到人。他还表示，传说卷所有内容不得重复出现在故事卷，更要杜绝编撰情况的出现，尽可能原汁原味。

福建省各地市负责人及联络员对编纂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虽然编纂过程中存在人手不足、时间紧、任务重等问题，但始终会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完成收集整理工作。各地市将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和方案，最大限度地我省民间故

事、歌谣、谜语原貌展现，保质保量完成 2019 年福建省大系 4 卷编纂任务。

（转自微信公众号：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下卷》编纂 工作会在鲁山召开

按照中国民协和河南省文联的统一部署，河南省从 2018 年 7 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省级示范卷的编纂工作，经过各位编委的共同努力，已完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初稿编纂，并已完成第四稿的修改。根据所收录谜语的数量，一卷很难容纳下，经请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确定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物谜，下卷为事谜、字谜、其他及附录。上卷部分（物谜）已经交稿。为保证下卷尽快编纂完成，2019 年 7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下卷》编纂工作会在鲁山县召开。

会议之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编委会已连续发出“关于继续征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下卷》编纂资料的通知”“关于征集当代河南灯谜代表作的通知”“关于征集河南民间字谜和当代河南原创字谜的通知”，根据下卷的编纂内容，再次向全省征集事谜、字谜及灯谜代表作。

参加本次编纂工作会的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编委会成员、鲁山县民俗学者等 30 余人，会议由主编刘二安主持，鲁山县文联主席郭伟宁致欢迎词，县政协副主席邢春瑜讲话。刘二安介绍了下卷编纂工作的主要任务，作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各地编委汇报了资料征集整理情况。会后，向到会的部分《中华灯谜年鉴》编委颁发了聘书。

谜语，包括事物谜和文义谜。处于两种不同体裁的谜语中间结合部的，是民间字谜，民间字谜兼有事物谜和文义谜二者的特征。河南民间流传的字谜数量较多，在征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编纂资料时，就搜集到将近一千个单字、四千多首民间字谜，经过筛选，最后编入初稿的还有八百多个单字，两千多首字谜。河南鲁山、南乐有仓

颉文化遗址，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漯河是《说文解字》作者字圣许慎故里。汉字在河南这方土地上创造、发展、成熟，如此源远流长的文字传统与丰厚的文字积淀，不可能不在河南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或许正是河南民间字谜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多的原因。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下卷》将汇编河南流传的民间字谜以及文义谜中的字谜，既全面收集、保存了河南字谜文献资料，也为今后开展河南字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鲁山县仓颉文化历史背景独特，民间传承鲜活生动。相传仓颉死后，葬于鲁山仓头，黄帝赐名仓子头。仓头有造字台、仓颉冢，冢上有仓颉祠，“仓颉造字”传说被平顶山市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山县仓颉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2017年以来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世界汉字节。工作会后，与会人员还考察了仓头乡仓颉祠，并建议在以后的世界汉字节中增加字谜元素。

（转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学术视野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

朝戈金¹

摘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是文学史撰写的指导原则，更是一种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发展历程的新视角。少数民族文学中很大部分为民间口传文学，它与文人的书面创作形成互动的关系，不应该处于中国文学史之外。对于文学现象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地方性知识和普适性学理之间营造出具有张力的认识论域。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 口传文学 文化立场

¹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

按照我的理解，“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单是指撰写文学史的指导原则，也是指对中国多民族的文学互动发展历程给出某些新阐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国际上近年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新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历程的实际，就下面三个话题，稍加议论。

第一，如何看待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多民族文学史观有什么作用？

今天，文化多样性日益被国际社会中多数成员接受和认可，并且成为许多国家文化政策制订的纲领和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关系，就是一个首先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汉族文学传统与少数民族诸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学科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属于“二级学科”，是包容在中国文学学科之内的。但是，在实践中，惯常的做法是把汉语/汉族文学拿来，与一个集合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并列或对举。这种划分方法和表述，或隐或显地传递着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汉族文学传统历史悠久，传世作品极为丰富，且成就很高，是中国文学格局的主流，当得起以一对多。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传统，或者因人数少而传播不广，或者因历史不够久远而积累不丰，或者因尚处于“无文字社会”而没有文人创作，自然难以与汉族文学传统“平等对话”。通俗些说，一个整体的“大传统”，置于跷跷板的一端，当然压得住另一端众多的“小传统”。这种看法，有个认识误区：那就是如何理解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的“分量”。文学的分量，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往往是那些文化文明成果中具有创造性的部分，那些对文明和进化发挥关键作用的部分，而并不简单以特定文化秉持者人数多寡、传播区域大小而论。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的价值判断，主要依据的不是数量的堆积，而是其形态和功能、其原创性与实用性等环节的考量。这就像说到自然界，某些当今已然存量稀少的物种不仅不会被看作“非主流”而遭到轻视，反而会因为它的濒危处境受到格外关注和保护。我们都知道，生物基因多样性，是让人类这个物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某些珍贵的不可再生生物基因的缺失，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以今天人类的认识水平，或许还难以全面认识清楚。文化的基因也是这样。文化基因的脆

弱和濒危、文化生态的日渐恶化，一如自然界的情况。许多文化“基因”的价值和作用，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也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清晰的认识。那么，在价值取向上，我们就要从立足于保护文明成果的需要出发，对各种文明成果中积极有益的部分，认真加以立档、保护、保存、研究和复兴等等。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对汉族文学与诸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的理解，要更多考虑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就包括对异文化的充分尊重、宽容和理解。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可以说，汉族文学与诸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处理为以一对多的关系，而是充分强调其多层面交织的、叠加互渗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不把汉族文学传统与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看成是1对55的关系，而是看成这55中的每个1，都是与汉族的1平等的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流和对话。地域的、族群的、方言区的、以及其他以特定文化尺度标示出来的文化界限，都各有内在的生命运动轨迹，当然也都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平等对待。

第二，如何理解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书面文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构造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有什么意义？

在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书面文学并存的当今世界，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传承传播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20世纪中叶国际人文学术领域一道颇为壮丽的景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上多个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书写与口传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在这里提到面世于1960年的被尊为“口头程式理论”之“圣典”的《故事的歌手》。该书作者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哈佛大学教授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这本看上去主要研究南斯拉夫“英雄歌”的专题研究著作中，洛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说明口头传承的叙事具有许多不同于书面文学的特质，具有不同于书面文学范式和美学家法则的独特的审美景观。稍后的几年间，在欧美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了几种著述，不约而同地围绕“口承—书写”问题展开论辩。焦点就是在人类的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存在认知与现代心智的“大分野”？参与到这场讨论中的学者，是鼎鼎大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传播学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以及古典学家埃瑞克·哈

夫洛克（Eric Havelock）。他们个个名头响亮，号召力很大，随即引发了多个学科的热烈回应和讨论。大略地讲，这些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叫做“书写论”，一个叫做“连续论”。书写论这一派认为，逻辑思维（演绎推理、形式运算，高次心理过程）的发展取决于书写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没有文字的应用，就没有人类今天的文明成就。与他们大唱反调的学者，史称“连续论”派。他们的持论，与“书写论”针锋相对，认为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相似的功能——传递信息。文字对心智发展施加的影响，不应当过分强调。诚然，书写技术与口传技术这二者的载体确有实质性的区别，可它们之间并没有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人类心智的发展进化是“连续”的过程。以这样的认识论为基础，“民族志诗学”和“口头传统”的研究热潮也应运而生。在晚近几年的发展中，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弗里（John M. Foley）的新书《如何阅读口头诗歌》有极为充分到位的表述。一般而言，在西方人文学界，近年对于以往过分看重书面文学而轻视口头传统的学术文化倾向，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作为有力的反拨，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和学界对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样的学理性思考，与我们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有什么联系呢？应当说，联系很密切。在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中，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过程，产生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现象，揭示了文化对话的奥妙与真谛。对于我们的提示就是，一则，口传抑或是书写，不是判定作品高下的尺度，它们二者之间，有时是处在可以互相转化的进程中。例如被视为西方文学滥觞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经由学者的考证，发现它最初的创编和流传，都是在口耳之间形成的，后来才逐步通过文字完成了文本的定型化过程。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也被认为是经过长期口头流传方才出现的人类文明的“奇迹”，具有极高的思想文化艺术价值。二则，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差异不在介质，而在规则。而且，其间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观察到那些介乎两极之间的文学现象。例如来自民间、又经过文人整理的、“以传统为导向”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乃是介乎文人与民间之间的产物。以创作者而论，也有介乎于文人创作者与民间歌手之间的例子，如对柯尔克孜英雄史诗传统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创编者和演述者居素甫·玛玛依。三则，在一个民族这里是书面传播的叙事，到了另外一个民族那里，会转

化为口传形态。手边的例子很多，例如蒙古族乌力格尔说书艺术《水浒传》，例如东蒙古的“本子故事”对汉族历史演义的再度创编和演绎，等等。总之，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应该是具备在更广阔的人文视野中论析文学现象和规律的理论气度，应该是在充分吸纳国际人文学界晚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成因和现实状况，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给出有力阐释的理论利器。具体到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话题上来说，就是要摒弃以往过于简单地将文人书面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学视为两极的处理方式，而将其理解为从纯粹的作家文学创作的一端，到地道的民间口头传统的另一端之间，其间有着大量过渡形态的种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双向化的谱系渐变关系。

第三，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理解不同文学传统的原生形态？这种理解对于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在我们谈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时候，涉及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对于文学现象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互动关系的把握，应该立足于什么立场，需要认真思索。近年在国际学界，尤其是在文化人类学界和民俗学界，特别强调对特定文化社区立场的尊重，强调对特定文化秉持者的尊重。而不同的族群，具有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价值尺度。就拿“诗歌”这样简单的问题来说，不同的传统对于诗歌的“格律”“韵律”，乃至什么是“押韵”，都有很不同的理解。“民族志诗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曾经指出，在欧洲人看来是散文体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民间叙事，在当地人那里却从来都被当作诗歌！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当中，对于诗体叙事的划分标准，也不同于汉族的诗歌分类体系。不仅韵体歌诗里出现这种情况，散体叙事也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就拿民间文学领域最为常见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三大基本文类而言，在世界各地就能见到很不相同的划分标准。在北美的许多印第安人部落中，民间散体叙事只是划分为两类：真实的故事和不真实的故事。这是简化的例子。也有更为复杂的，密克罗尼西亚的马绍尔群岛居民就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那里可以识别出五种“散体叙事”。其中三种，按照当代西方学术标准，属于神话和传说范围。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散体文类的划分实践中，也常常能看到彼此不合卯榫的情况。鉴于这类现象普遍存在，且难于把握，有学者创用了“原生的”和“分析性的”两组概念

（阿兰·邓迪斯），前者指本土的概念和分类体系，后者指学术界的概念和分类体系。我们在谈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时候，如何看待这些“原生的”体系，如何对其加以学术性的分类和归纳，进而如何进行不同文化间的文类比较等，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这里，我们既不能认同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态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和不能进行跨文化比较的，也不能采取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态度，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普同性而抹煞差异。面对这种情况，坚守一种毫不含混的、基于学术伦理原则而确定的立场，就变得十分重要——在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学理的两造之间，形成充满张力的认识论域，由此作出学术史的反思和总结，或可搭建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不同民族文学现象和规律的理论构架。

· 论文推介 ·

中国古代海洋观念的转变与浙江海港的发展 ——浙江海丝文化考察调研报告

毕旭玲¹

海港的出现与发展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发的重要基础，因此对海港的研究也就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海港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对外贸易政策、商品经济发展等社会因素。上述这些因素都是显见的，但在这次中国民协组织的浙江海丝文化考察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海洋观念对海港的发展也起着重要而独特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

一、早期海洋观念与军事港口的建立

¹毕旭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原载于《大海和声——浙江“海丝文化”调研文集》，学苑出版社，2019年。

古代中国是以陆地文明为主的国家，对海洋资源的探索与开掘长期局限于沿海地区的民间。隋唐以前，官方组织的海洋探索的活动很少。这与传统海洋观密切相关。与当代浪漫、诗意的海洋印象不同，海洋在我们祖先的观念中，是一片阴森可怖、昏暗凶险的地域，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比如汉字的“海”，从“水”从“晦”。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海，晦也。”“晦”是昏暗的意思，指农历初一月亮最晦暗之时或太阳落山。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干脆直接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海就是暗昧幽冥，茫然不知边际的地狱。这样的“海”并不一定指自然水体，而是被视作疆域的边缘。《尔雅·释地》说：“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古人还将岭南和闽越统称为南海。

作为暗昧幽冥的代表，早期海神的形象也是十分狰狞的。比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北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人面鸟身，耳朵上带着蛇，脚下踩着蛇，这绝不是和善的神应该有的形象。如此狰狞的海神形象的背后，是畏惧海洋，甚至视海洋为敌的早期海洋观念。

在早期海洋观念的影响下，官方在沿海兴建的港口几乎都是军事港口，其主要职能是拱卫陆地的安全。比如作为浙江沿海重要海港的宁波港，其雏形就是古代越国营建的水上要塞句章港。宁波博物馆的展览为我们普及了古句章港的知识：吴越争霸时期，甬江流域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造船业的进步尤其突出。越国在句章设置造船厂，制造战船，训练水师，促进了越地港口的形成，句章港由此脱颖而出。因为宁波地处海道要冲，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侵袭，因此其军事港口职能持续了很长时间。元代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卷二〇中指出：“庆元（宁波古称）联蛮国，入海最近，稍失控御，兵衅不可测。”文献所记录的浙江沿海具有重要军事拱卫职能的早期军港还有不少，如会稽港（今杭州市东南）、回浦港（今临海市东南）、东瓯港（今温州）等。以会稽港为例。会稽在先秦时期属于越国都城。根据《越绝书·外传记地》记载说：“会稽城有水门，又有‘石塘’”。石塘是停泊军船的地方，应该就是军港。汉代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派中大夫严助从会稽港发兵，海路驰援“东瓯国”。建元六年（前135年），大司农韩安国从会稽港口出兵，袭击闽越。

大量军港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实际的军事用途，但更重要的是各陆地政权对海洋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害怕受到来自海洋的侵犯。因此尽管在隋唐时期，已经开展了面向海外国家的官方朝贡贸易，遣隋使、遣唐使不断来华，但畏惧、防范的海洋观并没有根本改变，主要表现在安史之乱之前民间对外港口贸易被严格禁止。比如通过这次考察我们得知：鉴真六次东渡中有三次被官府阻拦而未能成行。第二次失败以后他漂流到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在这里，他备受当地士绅和僧人的尊崇。为了阻止他出海的危险行为，在他准备第三次从明州港启航的时候，当地士绅和僧人报告官府进行了拦阻。因为唐代律法规定，私自出海可以判处一年徒刑。当时的明州港是少数几个可以接受外国人登陆的港口。而明州港成为对外开放港口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遣唐使船受洋流、季风的影响，偶然停泊到明州港才开启了明州港作为官方对外港口的历史。但一直到安史之乱之前，政府并不允许私人海外贸易。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唐政府的政令几乎名存实亡，江浙沿海大规模的民间贸易才逐渐兴旺。尤其是晚唐，在扬州港已经不再通航以后，绝大部分商船都从明州港出发。

二、海洋观念的转变与浙江贸易港口的兴起

虽然出于对海洋的畏惧等观念，政府禁止百姓私自出海，但这并非意味着在唐代及以前的中国就没有港口贸易。相反，唐代的港口贸易相当繁荣，浙江沿海的一些港口也因此发展起来，比如明州港、舟山港、越州港（绍兴）、永嘉港（温州）等。但此时的港口并非双向自由贸易港，港口贸易的明显特征是以官方朝贡贸易和坐等蕃商来港为主，民间贸易被禁止，主动贸易几乎没有。这一现象在五代时期的浙江得到了很大改变。

当时浙江全境都属吴越国所辖。在经历过唐末的藩镇割据战争以后，吴越国主钱镠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修农桑、兴水利的同时，还重视发展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等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旧五代史·钱镠传》记载说：“钱镠鼓励‘扬帆越海’的航海贸易，且航海贸易收入颇丰，‘岁贡百万’”。钱镠与之前统治者对待海洋的态度完全不同，没有畏惧海洋，反而主动发展海外贸易，而非坐等蕃客前来交易。在吴越国政府的积极鼓励下，浙江沿海的自由贸易港发展迅速，连政治中心杭州都成为重要的自由贸易港。但杭州湾潮高浪涌，不少海船出于安全的考虑，常常先停泊在明州港，然后通过杭州与明州之间

的杭甬运河转入杭州。

可以说，五代时期是中国传统海洋观念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第一批双向自由贸易港就在当时的浙江沿海成长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州港。

明州港兴起较晚，其中偶发性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宁波博物馆等处了解到，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派遣的四艘遣唐使船，除一艘漂流到安南之外，其余三艘都恰巧在明州登岸。这是有记录的最早到达明州港的外国海船，也可以视为明州对外通商贸易的开始。也就是说，明州港兴起于唐中叶以后遣唐使的全盛期几乎已经过去的时期。唐中叶以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一方面，与明州港距离不远，同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中部的扬州港逐渐衰落，这就给了明州港的崛起以很好的契机。造成扬州港衰落的因素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河道变迁。唐中叶以后，扬州城外的长江河道向南迁徙，导致河口东移，海潮无法到达扬州城下，海船不能停泊，明州港因此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唐中叶以后的藩镇割据以及之后的战争造成了中央政令在地方贯彻的困难，此前对民间贸易的禁令就大大松动了，几乎名存实亡。民间积累的造船技术、航行技术等在此时大放光彩，民间的航海贸易很快兴旺起来。在最后一批日本遣唐使在明州登陆以后，中日之间的海上交往由官方的朝贡贸易变成了中国民间商船独领风骚的民间贸易，明州港也因此涌现出许多从事海上贸易的大商人，比如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公元842年，商人李邻德由明州港出发驶往日本，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中国民间对日贸易。根据《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13册《道方传丛书·入唐五家传·安祥寺惠运传》的记载：“公元847年，中国商人张支信等的海船从明州望海镇启航，得西南风相助，三个昼夜就到达了日本肥前值嘉岛那留浦，创造了当时最快的航速”。

唐中叶以后，因为政府政令松弛，在明州等港口，双向的自由贸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到了五代时期，这种民间自由贸易才真正被政府所承认。在政府的鼓励下，吴越国时期的明州港与国外的大部分航海来往都是纯商业性的。更有意思的是，连政府之间的往来也是通过海商进行的，这与唐代主要是政府之间的朝贡贸易大大不同。据载，吴越客商蒋承勋等多次往来中日之间，并为吴越国政府传递官方消息¹。当时的日本实行锁国政

¹ 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8—270页。

策，禁止日本商船出海，因此出现了吴越商船单向通航日本的现象¹。明州港及其他浙江沿海港口的繁荣，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海洋观正在转向积极和正面。

吴越国立国不长，仅七十余年，但它实施的支持鼓励民间航海贸易的政策在后世影响深远。宋政府也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了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能包括检查出海船只货物，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等。当时沿海港口的市舶机构分属密州市舶司、两浙路市舶司、福建路市舶司、广南路市舶司。其中，密州处于宋金战争地区，其作用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广州市舶司虽然设立最早，但它主要是管理海外的舶商，而福建路市舶司的设立则较晚。相比较而言，两浙路市舶司的设立意义更重大。两浙路市舶司设在杭州港。根据《宋会要》的记录，杭州设立的两浙路市舶司是在广州之后设立的第二个市舶司。《宋会要》记录了端拱二年（989年）五月诏曰：“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也就是说，各地出海的商船都要向设立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申请办理手续。两浙路市舶司是首次为了管理境内海商出海而设立的，这在中国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启了重视海外贸易、全面鼓励发展海外贸易的先河。

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长时间鼓励支持民间航海贸易的王朝。它不仅奖励市舶司中能招徕船舶的有功人员，也三令五申禁止那些营私舞弊的行为。这是因为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某些时期甚至是财政收入的支撑。宋王朝对海洋的积极和正面的态度特别明确，直接带动了浙江沿海港口的兴起和发展。杭州港、明州港、温州港、澈浦港在宋代的发展都很快，因此政府在这些港口都设有市舶机构，密度相当大，超过了南北其他省区沿海。明州港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很快成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海上茶路”的起点和通道。当时的明州港还成为宋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主要贸易口岸。北宋政府曾发文说：“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也就是说，凡是去高丽、日本的商船都必须到明州来领取出海许可证。明州港至高丽航路的开辟主要是受到宋辽之间紧张局势的影

¹ 参见王心喜：《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卷。

响。北宋早期从山东半岛到高丽的航路因此关闭，而改迁至明州。

当时浙江沿海的重要港口还包括温州港、越州港（属今浙江绍兴）、澈浦港（属今浙江海盐）、章安港（属今浙江台州）等。以温州港为例。温州港也是一个古老港口。唐代的温州港的单向贸易已经逐步兴起，有日本值嘉岛直达温州的贸易航线。北宋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兴盛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温州港的双向海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南宋绍兴初年市舶务的设立标志着温州港的航海贸易达到鼎盛。当时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温州港都是仅次于杭州港、明州港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些港口并不是散乱的，而是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杭州港、明州港是重要的中心港口，而温州港、越州港、澈浦港、章安港则是主要辅助港口，由此形成了前后相继的多层次港口体系。浙江港口体系的形成是传统海洋观念改变的产物，而港口体系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海洋观念的发展。在浙江沿海，较早出现了新的积极海洋观。

三、新海洋观念下的港口建设与士文化

新的积极海洋观可以概括为向海洋找资源、求生存、谋发展的观念，与传统畏惧、防范海洋的观念截然不同。新海洋观出现在浙江沿海有诸多表现，其一就是澈浦港的“创造”。澈浦港是浙江沿海的重要港口，也是杭州港的外港，分担了杭州港的不少港口功能。但在这次考察中我们发现：澈浦港并非一个天然良港，它之所以能成为港口，是被澈浦民众“创造”出来。

澈浦港位于杭州湾北岸，澈浦镇的南部，是进入杭州的门户。虽然在海边，但澈浦出海口的自然条件并不好，东南部靠海的地方只有两座平行的山：长檣山和葫芦山，缺乏乍浦港那样的天然港湾。因此，澈浦在北宋时期仅仅是一个盐场，港口没有任何发展。后来，距离澈浦很近的杭州港的通航条件受到地理环境和政治命令的影响，无法直接通海。这就客观需要一个外港，帮助海船停泊，并允许海船通过内河河道转到杭州。澈浦民众抓住这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在长檣山和葫芦山中间开挖了一条人工运河（塘），可以使海舶从海口直接驶往澈浦镇。具体的航道是这样：海口设招宝闸，海船到了澈浦海口以后，先停留在长檣山下的龙眼塘，然后通过招宝闸进入人工运河，再由人工运河转入原有的内河航道，在沿岸村镇进行商品集散和贸易。由此，南宋时期的澈浦港成为杭州港最理想的海上货物

集散辅助港。前来杭州的海外商船，常常在澉浦停泊并进行交易活动，当地不少居民都从事于此相关的行业，“惟招接海南诸货物，贩运浙西诸邦”（《澉水志》卷上《地理门》）。因为澉浦港的迅速发展，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南宋政府在澉浦设置了市舶官吏，后来又在澉浦镇东设置了市舶场，正式接纳前来杭州的外商船只。因为港口的发展，澉浦镇曾相当繁华，有“小杭州”的美誉。不少内河沿岸村镇的名称也颇具特色，如广陈镇，就是因为海舶带来各种货物“肆列珍异，远近贸易”而得名“广陈”。因为航海贸易成为澉浦的支柱产业，澉浦港口还修建了妈祖庙，来往客商均在这里焚香祷告。虽然如今的澉浦妈祖庙早已衰落破败，但从妈祖庙的地理位置及其建筑残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时妈祖信仰的盛况。

澉浦港实际上是一个半人工半天然的港口，而澉浦开挖的这条人工运河的水，来自澉浦镇的西边的山上。为了不让山上的水过度流入人工运河，又在山下设坝阻挡，因而形成了一座湖泊，就是我们去过的南北湖。湖水向东通往人工运河，一直到招宝闸，所以运河的水位基本是稳定了，从而减少了潮汐变化和海上风浪对于船只的影响，形成了优良的停泊条件。所以说，澉浦港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当时规划者的大智慧，是在新海洋观的指引下诞生的一朵中国古代港口建设史上的奇葩。

澉浦航海贸易的兴盛促生了当地的航海世家，元代著名的澉浦杨氏家族就是从航海贸易起家的。元初的时候，杨氏家族的杨发曾总领浙东、浙西舶事，也就是总管杭州、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等港口的对外贸易活动。后来，元世祖提倡官本船贸易为杨氏家族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所谓的“官本船贸易”就是政府支持航海贸易发展的一项特别优惠的措施。具体做法是：官府为海商建造海船，并发给他们本钱，派遣他们航行到国外进行贸易，所获利润，政府与海商按照七三分成。这其实是一项无需本钱的好买卖，只要航海技术过硬，有经商才能都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杨氏掌握了航海贸易的监管权，其家族对于海道又很熟悉，因此招引了不少海商，为其赚钱，很快成为具有地域垄断性质的航海世家。杨发的儿子杨梓、孙子杨耐翁以及重孙杨枢都是著名的航海贸易家。杨耐翁曾任海道都漕运万户，他的儿子杨枢 19 岁时就乘官本船航行西洋，并从今天的伊朗贩回了白马、黑狗、琥珀、葡萄、酒、番盐等。以杨氏为代表的航海世家的崛起及其航海行为中极其明显地体

现了新时代海洋发展观。

新海洋观在浙江沿海产生与发展的第二种表现是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及其文化行为。当然，江南士大夫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不准备做过多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江南士大夫的形成的心理基础，一定与新海洋观有密切关系。

要想向大海求生存、谋发展，必须有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是新海洋观的伴生物。新海洋观和新心态对浙江地区人文精神有重要影响。双向自由贸易港所代表的开放、包容的特质逐渐融入到江浙沿海地区的人文精神中，培养和造就了从唐宋开始，一直持续到元明清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影响的江南士大夫群体。这一群体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有利条件，放眼长远，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能，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社会风潮。在这一群体身上，充分体现了新的海洋观。宁波天一阁的建立及其藏书，其实就是新海洋观和新心态的产物。天一阁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藏书楼。我们在参观天一阁的过程中注意到，天一阁主任范钦的收书范围很广。天一阁的藏书有孤本多、抄本多、精校本多、金石碑刻多的特点。地方志和科举录是其中最具有特色藏书种类。没有开放、包容的心态绝对做不到。

综上，我们看到在浙江海港发展过程中，古代海洋观念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不仅推动了双向自由贸易港口的产生，还促进了浙江港口体系的形成，对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稳步推进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以下简称《唐卡档案》）自2013年立项以来，在项目组、专家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等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数年进行了大规模、全面、细致的普查工作，至2019年，项目各卷本均取得不同程度的重大进展。6月底至7月中旬，

《唐卡档案》第一次编辑工作会及 2019 年工作推进会相继召开。

6 月 28 日，纪念西藏自治区民主改革 60 周年——《唐卡档案》第一次编辑工作会暨藏学出版青岛研讨会在青岛出版集团一楼艺术馆举行。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邱运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天津市政协委员、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冯宽，中国民协理事、《民间文化论坛》副主编冯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当增扎西，中国民协办公室原主任、副编审谢桂华，《唐卡档案》设计师张亚静，青岛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李海涛，青岛出版社艺术出版部主任申尧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

邱运华在致辞中说，感谢冯骥才先生倡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唐卡档案》作为其中很重要的子项目，具有重要价值。唐卡文化不仅涉及藏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更是藏族人民精神世界的表达，也是独特的艺术形式。感谢项目组专家的不懈努力和青岛出版集团对此项目的高度重视。他对即将出版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甘南卷》和《藏娘卷》等六卷的学术规范、编纂体例、图片质量等进行了强调，希望项目编纂组和监修组按照计划开展工作，各卷本主编和编辑团队要密切沟通，确保将稿件按时、保质保量交付出版方，并对后续卷本的启动进行了部署。他预祝《唐卡档案》各卷本的编纂、出版等环节的工作都能进入快车道。

李海涛在致辞中说，唐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级的经典文化艺术形式。《唐卡档案》项目已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唐卡档案》也是集团向西藏自治区民主改革 60 周年的献礼。多年来，集团致力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陆续策划出版了《云冈石窟佛造像典藏卷》《云冈石窟全集》《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等一批精品力作，连续 11 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连续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出版重点规划，大大提升了集团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今年，青岛出版集团连续第四次获得“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提名称号。感谢中国民协和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的信任，集团将倾注全力，按照精品出版的标准，将《唐卡档案》项目做好。李海涛还就即将出版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甘南卷》等六卷编辑过

程中会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冯宽在致辞中说,《唐卡档案》项目是中国民协、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和青岛出版集团的第二次合作,此次合作的目的同样是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唐卡在物质层面是藏传佛教的艺术象征、文化符号;在非物质层面上,又与藏族群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承载着藏族文化特有的神圣性。抢救藏族宝贵的民间文化是我们的初心。《唐卡档案》项目启动,是历史上首次对唐卡这一中华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跨越多省区的文化行动。《唐卡档案》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将唐卡研究置于整体的文化之中,为灿烂的文化遗产立档是我们的使命。

谢继胜在致辞中肯定了《唐卡档案》项目的重要性,强调了其出版价值。《唐卡档案》项目收集整理工作按照活态艺术文化整理,既保存唐卡文化形式,又呈现其赖以生存的空间,保留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这在全国还是首部。

李海涛代表青岛出版集团向谢继胜、当增扎西、冯莉、谢桂华颁发了聘书,其他与会专家也一一发言。会后,与会领导、专家还就《唐卡档案》的监修、审稿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7月17日,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办、甘孜州康巴文化研究院承办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唐卡文化档案》2019年工作推进会”在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召开。来自中国民协、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全国社科工作办、甘孜州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协、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青岛出版集团、青岛出版社等单位的领导嘉宾,来自甘孜州康巴文化研究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卷本项目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等35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任徐岫鹃主持。

本次会议旨在推进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各卷本进度、保证项目编纂水平、进一步推进项目的顺利完成。

全国社科工作办处长孙璐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应寻求学术生长点,实现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同时,通过项目的推进,培养锻炼年轻骨干。要牢记习

总书记的“四力”标准，坚定政治立场，推出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重要学术成果，推出重视学术质量的精品力作、传世之作。

冯宽在发言中表示，自2013年项目启动至今的6年时间内，唐卡项目组成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唐卡项目是对活态唐卡文化的一次规模空前、跨越多省市的调研。这一行动唤起了人们对唐卡的关注，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对于传统文化，比抢救更重要的是保护，比保护更重要的是唤起全民族对文化的热爱、关注与关心。希望各卷本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完成普查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

申尧介绍了目前卷本的出版、编辑工作情况，指出了已收文稿在学术规范、编纂体例、图片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部分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规范《唐卡档案》的编纂和编校工作的具体要求，为后期高水平、高效地完成项目出版工作打下基础。

冯莉就目前进展情况进行汇报发言。她介绍了项目进行的几个阶段和目前各卷总体进度概况，并提出项目组将进一步加强学术规范，高效推进编纂工作，同时要加强组织协调工作、密切联系各方，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稿件提交工作，确保各卷本如期出版。

随后，《甘南卷》《拾零卷》《德格卷》《拉萨卷》《阿里卷》《苯教卷》等卷本主编、执行主编相继进行汇报发言。

最后，邱运华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讲话，对目前项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给予肯定。他指出，《唐卡档案》作为抢救工程之一，具有艺术性、民族性、宗教性、学术性的文化综合性特点，在后续的项目工作中，项目组应严格把握出版流程，保证学术质量，稳步推进工作。他强调，唐卡项目一定要尊重民族性和宗教性，不仅要体现民族文化的传统，更要保证政治、文化、宗教的安全健康。他表示，唐卡项目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促进唐卡艺术的发展方面意义非凡。

（根据张凯歌、李航所撰报道综编）

中国民协与广岛大学初步达成学术交流合作意向

7月4日下午，以日本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为团长的访问团一行3人顺访中国民

协。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邱运华，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以及中国民协外联处全体干部参与了座谈。

双方就各自的业务范围及工作内容进行了交流，并对双方今后可以合作的项目内容进行了探讨，达成了初步的学术交流合作意向。邱运华建议从学术层面双方可以就民间文化的专项课题举办双边的交流会或研讨会，从活动方面可以举办工艺类的专项展览，从人员交流方面可以让双方的民间艺术家相互交流考察。佐藤利行副校长表示，广岛大学在民间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广岛有日本非常有名的能舞（中国的傩舞），日本最出名的铜雕大师也在广岛。广岛大学很愿意邀请中国民协的专家到广岛大学讲学，也有展览场地可以做专题展览，也希望在学术上与中国民协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会后，双方签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日本国广岛大学学术交流协议书》。约定在今后5年，就推进民间文化共同研究、专业人员交流、科研成果、学术刊物以及学术信息共享等方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李刚）

“中国民间文学前沿话题”学术研讨会 在辽宁大学召开

7月6日下午，“中国民间文学前沿话题”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书画研究院举行。中国大学生故事基地专家评审组成员以及辽宁大学部分师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辽宁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吴玉杰主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帆对专家发言进行评议。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文科视野中的中国故事、故事的艺术转化及创意实践、故事的现代传承与传播、故事研究的新维度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政协副主席刘华从故事创作的角度，对故事在当下社会的传承及传播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随着故事传播手段的创新，在故事内容的创作上也要重新进行思考。联系当下的创作实际来看，必须引导作者讲好今天的故事。对此，刘华副主席提出，讲好今

天的故事，首先，要学会关注现实生活，要聚精会神，专注于生活中的新发现，而不是跟风趋时。其次，要关注当下社会的普遍情感，当一些美好情感变得越来越可疑的时候，当正义感、责任感等一些美好的品质被漠视、被曲解的时候，故事创作应该理直气壮地讴歌人间的真善美，用故事来抚慰当代人的心灵。再次，要加强文学修养和传统文化的修养，时刻牢记故事是文学样式之一，要用文学的眼光和理想表达文学的意义。一则故事，因为修养到了，也会深厚起来、丰富起来、生动起来。最后，讲好今天的故事，应有生动的表情。我们要生动且幽默地讲述故事中的严肃话题，学会寓教于乐。

中国民协副秘书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大学教授黄涛从会议主题“传承”与“创新”出发，对民间文学传统理论进行了反思。黄涛认为，网络的出现，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社会生活分成了网上生活和网下生活，在新的社会生活下，民俗、民间文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口头传播的力量削弱的同时，网络传播形式更为广泛。从故事的传承性来看，传统形式逐渐消失，原汁原味的故事很难再现。故事的变异性也变成了枯燥的复制粘贴，而群体性更是直接转变成非匿名的作品。因此，民间文学的理论也应当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

中国民协顾问、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从“发现故事、走进故事、传承故事”三个方面做了发言，着重阐释了故事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牢记过去的故事，是因为故事具有自身的生命力，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故事，人们需要认知到自己与故事的关系，需要亲近故事，亲近生活。只有真正走进故事，走进记忆，才能深入思考其中的文化内涵。

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白旭旻发言的提目为《发现自己的伟大——民间文学 3.0 和故事学的诞生》。他认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的伟大成就相比，中国民间文学 40 年的伟大成就和一系列超级文化工程，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其作用、意义被严重低估，理应产生的学术影响也未达到预期。对应“传统民间文学、新故事、当代民间文学”三种文学形态，具有发展史观的和文化独立性的中国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该与中国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相匹配，方法论、工具性的更新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他简要概括了民间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强调传播

媒介对民间文学样式的决定性约束和造就。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历经数千年传统民间文学的“口传”历史、60多年新故事的“文传”时期、当代民间文学的“屏传”时代，有着清晰、完整、独立、独特的发生、发展、变异、化生的脉络。全媒体类型、全行为模式形态之下的民间文学，即“屏传”时代的民间文学，具有足够的兼容性和包容性，我们或将迎来“故事学”的诞生。

他希望学生通过写故事、讲故事、演故事、画故事等等形式，把当代大学生的天赋异禀真正展现出来。同时，也希望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要关注民间文学的时代化及现代性，并给予故事更多的关注。

中国故事委员会秘书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宋德全从数十年坚守民间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出发，谈了对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现代性等问题看法。他强调要“改变观念”，坚守文化自信，并表示期待民间故事能够焕发出新的光芒，实现故事内在价值的传承。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福岩在亚里士多德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就如何理解“讲故事”这一行为进行了理论解读。他认为，讲故事是广义的叙事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一切活动都由此出发。讲故事的本质就是说话，是说话的一种衍生物。它是一种和平的，形成自我认同和我们认同的唯一渠道。因此，讲述故事是一种意义的建构。通过叙事、情节的行动模仿，听者能够从感官的、情感的或者是情境思维的层面，过渡到存在论和本体的层面上，理解到故事中的精神世界，这才是讲故事的价值所在。

研讨会下半场，民间文学杂志社原主编刘绍振，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副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郁林兴以及辽宁省民协秘书长刘蕾等人，对民间文学创作的实践、故事表演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刘绍振认为故事都在生活里面，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年龄不同，对生活的观察角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的故事就会不一样。而作为正值黄金时代且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要写好自己的故事，就要多读书、多经历，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更敏锐，成为国之栋梁。

郁林兴对大学生应该如何写故事的问题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大学生的故事创作题

材要选择自己熟悉的，第二是创作的故事要贴近时代，第三是故事的主题一定要充满正能量。

刘蕾认为热爱是首要前提，有了热爱，就能坚持做好任何事情。大学生故事基地首先要点燃大学生对故事的热爱。

各位专家发言结束后，江帆对研讨会内容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此次民间文学前沿话题的讨论，体现了较高的学术品质，一方面表达出强烈的学科拓展意识，对于民间文学一些概念的制约性和滞后性，学者们根据自身体验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实践性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江帆认为，对民间文学概念的阐述和重述，体现了学者们所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是对民间文学发展所做出的积极探索。民俗和生活是同步发展的，当下故事仍具有功能性，当下的叙事谁来倾听，需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

最后，吴玉杰也分享了自己对这次研讨会的感受。她认为，我们是听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是研究故事的人，但我们其实都是故事中的人。今天在座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包括江帆老师的点评，将来也许可能是我们当中某个人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或许专家在讲话过程当中的一种特殊停顿，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大学生故事基地活动其中的一个要点，这个点可能会逐渐演化成面，从而谱写出更好的中国大学生故事。

研讨会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但关于故事在当代社会的创新与实践、故事的现代传承与传播、民间文学理论的思考仍将继续。中国大学生故事基地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前行。

（中国民协供稿）

重访“张库大道”——深挖草原丝路的民间文化遗存

7月19日至28日，由中国民协主办，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民协共同承办的“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调研活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正蓝旗、阿巴嘎旗、二连浩特市等地实施。

中国民协顾问、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中央民族大学“一带一路”与民族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宝山，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杨荣国等一行和当地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沿“张库大道”一路北上，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考察调研活动。

“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大境门外西沟出发至乌兰巴托（当时称“库伦”），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一条兴盛了数百年的古商道。此次考察调研活动旨在深入挖掘被誉为“草原丝绸之路”和“北方茶叶之路”的重要节点——张库大道沿线的民间文化遗存，为促进“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做出努力。

调研第一阶段，专家组走进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第二阶段，专家组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正蓝旗，从阿巴嘎旗一路西行至二连浩特。10 天之间，先后考察了沿线的驿站文化、民间艺术、故事传说、古城遗存、民居建筑等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存。

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鸡鸣驿始建于明代，是我国古代邮传、军驿的宝贵遗存。城内建筑分布有序，驿文化主题鲜明，是历史上张库大道商贸邮驿兴盛往来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专家组先后考察了中国鸡鸣驿邮驿博物馆、文昌庙、指挥署、财神庙等建筑留存，并登上城墙遥望鸡鸣山、俯瞰鸡鸣驿，触摸这里曾经的喧嚣记忆。

宣化古城始建于明洪武 27 年，是中国北方现存古城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著名城池，也是长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专家组一行登上清远楼（钟楼），遥望镇朔楼（鼓楼）、拱极楼，了解古城历史文化。

在张家口市市区及周边，专家组先后考察参观了堡子里、大境门、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和万全右卫城。堡子里建于明宣德年间，是张家口市区的“原点”与“根”，是张库大道繁盛时期中外商贾聚集之地。堡子里存有文物古迹达 700 余处，其中极具价值的重点院落有 93 处，是全国大中城市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建筑城堡之一，堪称北方民居博物馆。

大境门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国际货物贸易的内陆口岸，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在这里换成了丝绸、茶叶、瓷器和白糖，是张库大道重要的商贸文化枢纽。

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是我国首家以驿站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科普场馆。伊林驿站设于清嘉庆 25 年（公元 1820 年），是张库大道的重要节点。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实物、文字、展品及雕塑，展示了北方茶丝之路、张库大道和欧亚大陆桥为一体的“路一道一桥”线索。

专家组通过参观博物馆，对古代驿站制度、草原丝路文化及相关历史主题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在河北省万全县旧堡村的新新剧装厂，刺绣艺人正在赶制戏服。专家组考察参观了剧装厂，并与刺绣艺人进行交流，了解当地刺绣文化及艺人的生存状况。

在河北省康保县，专家组走访了康保二人台艺术团。二人台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它的音乐起源于元代散曲，有的可追溯到唐宋大曲，它的小戏及唱腔有相当数量来源于元人小令及明代民歌，被誉为“元曲遗韵·民族华声”。艺术团演员为专家组表演了《走西口》《怀胎》《拉骆驼》等曲目，展示了康保二人台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专家组走进了蒙古族牧民家中，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文化。蒙古族的饮食习俗以奶食、肉食为主，马奶是蒙古族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饮品。在锡林郭勒盟，民间除了年节之外，还在每年的夏天过“马奶节”。在牧民乌其拉图（音）家中，女主人为专家组端来了新鲜的马奶，7岁的女儿迪格木（音）唱起了蒙古族民歌。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专家组参观了迄今国内唯一一家由家族出资筹建的马具博物馆。博物馆的馆藏囊括了辽、金、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的各类马具精品500余件（套），详细介绍了马具的种类与马背文化的沿革，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工艺技术、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与马之间交流互动的人文理念与文化内涵。

居住在崇礼区高家营镇响北营村的岳作亮老人今年已经87岁，他的爷爷是岳家第九代跑“老信车”的人，曾七次经张库大道抵达乌兰巴托与恰克图，见证了这条路上商贸往来的繁忙景象。专家组来到岳作亮老人家中，与他聊起爷爷当年跑草地的往事，看老人表演爷爷从俄罗斯学来的魔术，听老人念奶奶教给他的歌谣。交谈期间老人两度落泪，令专家组动容。

在张北县的大雨中，专家组踩着泥泞的村路来到庙滩村乔旭中老人家中，听老人讲述长辈当年跑草地时的驮帮生活，并与儿子乔平一起为专家组演示了当年栓牛连马的马扣系法，展现了草原丝路文化的活态传承。

华北牲畜交易市场早在明末清初就形成集散，因旧时北方的大牲畜交易多以马为主，

故华北牲畜交易市场古称“马桥”。今天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仍然车来人往，经专家组调研，这里目前有男性“马牙子”（牲畜交易中介，俗称“马牙子”）120余人，女性“马牙子”4、5人，他们仍然保留着过去“袖口吞金”的议价习惯，这是张库大道昔时牛马贸易珍贵的遗存。

公元1307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元武宗海山在张北县始建元中都，与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大都（北京）并称元朝三大都城。元中都是迄今国内保存最完好、时代比较单一、后期破坏最少的元代都城遗址。专家组考察参观了元中都博物馆，了解了元中都的历史和蒙元文化。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金莲川草原，是蒙古族建立在漠南草原上的第一座城市，这里曾经是元王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当时的世界大都会。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上都为夏都，每年夏历二、三月至八、九月，皇帝及随行大臣、官员等有半年时间在元上都避暑理政。元上都遗址以宫殿遗址为中心，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的总体规划形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体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专家组先后考察了元上都遗址、元上都博物馆。

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太子城遗址或为金代后期的皇室行宫，从已发掘的遗迹与遗物分析，太子城的规制、建筑布局等在全国极为罕见，城址还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太子城遗址填补了金代皇家建筑的空白，编号“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

内蒙古多伦县的汇宗寺是清王朝敕建的藏传佛教皇家寺院。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今多伦）附近会见蒙古各部、旗王公、台吉，史称“多伦会盟”。应蒙古封建王公所请，康熙皇帝“愿建寺以彰盛典”，修建了汇宗寺。

多伦县山西会馆于清朝年间由山西籍商人集资兴建，是当年晋商在多伦地区聚会、娱乐、议事的场所，主要交易茶叶、皮草、粮食等货物。山西会馆曾盛极一时，多伦城人口最多时达18万，注册商号4000余家，在当时有所谓“十大粮商、八大银号、五大烧锅、两大当铺”之说，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昔日的繁荣兴盛。

7月23日、7月25日，专家组两次召开座谈研讨会，对草原丝绸之路民间文化考察之行进行阶段性总结，对沿路的民俗文化、故事传说、古城记忆等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的保存现状、传承发展情况和未来工作方向进行了交流研讨，畅谈感想与思考。

曹保明表示，“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是中国民协主办的重大项目，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民间文化领域的重要工程。此行收获颇丰，调研组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追寻草原丝绸之路民间文化的久远历史、清晰传承、活态存在和鲜明特色，这是联系人类群体间、区域间、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令人欣慰的是，草原丝路文化遗产以活态的形式丰富地留存了下来，下一步应注重抢救在先，重点保护，深挖草原丝绸之路民间文化遗存，协助地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梳理历史，才有美好未来。

宝山从张库大道、传统记忆、实地考察三个核心概念展开了探讨。他提出，传统的核心是传承性，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存留，也包括对过去给予新的意义建构。此次考察调研活动从张库大道的口、线、面全方位开展，在各个村落中采用了启发式访谈的方法，获得了丰富的文化资料，逐渐厘清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脉络。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文史研究馆馆员、通志馆馆长邢野表示，通过此次考察，深切感受到了蒙古族人民对于旅蒙商的豁达、包容与理解，同时旅蒙商也有自己的道德准绳与底线，由此体现了蒙汉民族的融合，正是这种经济的汇通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一带一路”就是民族团结之路。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石家庄学院教授柴秀敏表示，此次考察调研活动有高度、收获大。此行众多专家和文化学者的加入，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调研方法，使这次活动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挖掘与唤醒文化记忆、寻找活态遗存、唤醒点滴乡愁的历史文化交流的高度，引发了我们对未来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等问题的思考，为以后的工作与研究明确了方向与目标。

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家口电视台原台长刘喜提出，自己过去都是从中国经济史的角度看待张库大道，注重文献资料的发掘，此行通过现场考察调研，收集了许多鲜活的一手资料，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尤其发现，张库大道的价值不仅仅是商队贸易，沿

路还有许多民间手艺人值得寻访研究，下一步将重点采访、考察、整理手艺人相关资料，对草原丝绸之路民间艺人的实际生活、生产状况进行进一步了解。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立军表示，通过实地调研，进一步了解了古人的邮驿文化及鸡鸣驿地位、张家口独特的地缘历史背景、政军商的驿道文明演变、旅蒙商的古今生活变迁、张库大道上的活态生活方式及民间文化的线索，增强了对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间交融的理解，切身感受到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意义，深刻认识到张库大道即是草原丝路的独特文明史篇，也是人类多民族变迁及商贸历史上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程溪）

潘鲁生：悼念冯元蔚先生

惊悉冯元蔚先生逝世，心中哀恸。回想2016年8月赴川调研期间，曾安排专程到成都看望冯元蔚主席，不巧主席在家乡休养，只在电话里汇报了民协的工作和民间文艺的有关发展计划。冯元蔚主席听了很高兴，嘱咐我们要传承好民协的良好学术传统，把民族民间文艺工作做扎实，多培养些青年人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工作。之后，也有几次相约，但都未能如愿。本计划今年7月底到成都拜见，聆听老主席教诲，不想竟成终生的遗憾。

冯元蔚先生曾任第五届中国民协主席，是令人景仰的民间文艺大家，为民间文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彝族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学家，他精通新老彝文，在彝族语言文字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厚造诣，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投身民间文学“采风”运动，遍访大凉山的彝族村寨，对凉山彝族地区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全面调查，不仅搜集了大量民间新诗歌和流传的民间叙事诗版本，还重点记录整理了彝族著名史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编纂出版了《大凉山彝族长诗选》《大凉山彝族故事选》，对彝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冯元蔚先生以彝汉双语对比研究为基础，开展彝文典籍整理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教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参与编写《彝族文学概况》，概为全国最早的彝族文学史教材，曾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选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等，以期汇集“各兄弟民族的文学成果、文学经验、文学发展史”，并于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1994年，冯元蔚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无论是民间故事、歌谣还是谚语，对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都是最生动、最有效的教材。民间文学的教育、审美作用，是别的文学形式不能替代的。我们应当把民间文学看作当今对青少年教育的最佳课外教材，使它在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大力推进民族教育，促进西南民族学院彝文专业等学科专业建设，培养的西藏少数民族学员大部分成为各领域骨干。冯元蔚先生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少数民族文化、哲学与社会历史，曾参与编写《西南少数民族名人录》《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等，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文探讨《加强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对民族地区发展的真挚感情、文化情怀和广阔视野。作为民间文艺学家、中国民协主席，冯元蔚先生始终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不仅从本民族文化研究入手，严谨治学，从政奉献，在深入的调查采录工作中采集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献著作，积累了宝贵的调研采风经验，而且大力支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他多次强调，四川作为祖国大西南的重要省份，抢救整理民间文学遗产极为重要。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四川省委、省政府很快批准了‘三套集成’的工作计划，并拨启动专款，同时令各地、市领导和宣传文化部门要切实负责，完成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2010年，中国民协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启动之际，冯元蔚先生欣然出任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怀着对民间文化、对乡村群众的深情，冯元蔚先生十分关心农村发展。“他是‘农家乐’三字的命名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郫县一家农民的乡村饭店取名‘农家乐’，当场挥毫留字，以示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发展乡村经济的喜乐，从此‘农家乐’三字成为中国农村一种新经济经营模式的专有名词在全国遍地开花”。

冯元蔚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实践贯穿中国民协数十年发展历程，是身体力行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歌调查运动”、八十年代普查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冯元蔚先生与老一辈民间文艺家、民间文艺工作者一道，开新中国民间文艺“采风”“记录”风气之先，并扎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研，以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执着热爱为出发点，将自己所熟悉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提升到专业研究、高等教育和更广泛的文化传播的层面，将民族民间文学的作品采录拓展到

民族文学史、民族语言学、民族哲学的广阔领域，将民族民间文艺的调研经验、研究方法和理念贯穿到中国民间文艺保护与发展的工作实践之中。冯元蔚先生以对民间文艺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奉献，成为民间文艺最高奖——终生成就奖的获得者，赢得景仰和爱戴。

从凉山彝族聚居区走来，作为中国民艺文艺学家，冯元蔚先生怀着对民族民间文学的赤诚情怀，在民间文艺的学术领域、文化实践和组织管理岗位上辛勤耕耘，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天，从冯元蔚先生的著作中和经历里，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艺传承发展最坚实的使命，能够更真切地体会到扎根在田野一线、深入于群众生活扎扎实实去研究、去保护、去传承和发展的品格和方法，能够更真挚地感受到民间文艺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民间情怀、民族情感和理想追求。

岁月川流不息，生命总有代谢，但学术的探索与贡献、事业的追求与奉献，将在星河浩瀚中留下奋斗的足迹，发出不朽的光亮。

冯元蔚先生千古！

冯元蔚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汪洋、陈希、胡锦涛、李瑞环、俞正声、王刚、杜青林、李蒙、陈宗兴、刘晓峰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送来花圈。

冯元蔚同志逝世后，彭清华、尹力、柯尊平等前往冯元蔚同志家中，看望慰问了冯元蔚同志亲属。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等，彭清华、尹力、柯尊平、邓小刚、王雁飞、范锐平、王宁、田向利、曲木史哈、甘霖、邓勇、王铭晖、王正谱、姜永申等省领导以及冯元蔚同志生前好友及亲属送来花圈。

据公开简历，冯元蔚生于1930年8月，是一名彝族干部。

据西南民族大学官网报道，1950年，西昌解放，冯元蔚报名参加了西昌军管会举办的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成为其最早的一批学员。后由于各地都急需干部，于是冯元蔚只学了3个月就被提前分配到军管会民族事务处工作。

1951年，冯元蔚进入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西南民族学院彝文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政治系、语文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等职务。

1980年，冯元蔚任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次年，冯元蔚作为学校唯一一

名少数民族教师晋升为副教授。

1982年，冯元蔚在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任上调职四川省委副书记，并于1985年5月当选四川省政协主席，至1988年卸任。1993年，冯元蔚不再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1988年、1993年和1998年，冯元蔚先后当选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其间于1996年任全国文联副主席，1999年任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2004年，冯元蔚退休。

冯元蔚曾长期从事彝文和彝族民间民俗文化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民间新诗歌和传统民间叙事诗版本。其学术成果主要有：翻译彝族传统史诗《勒俄特依》，教育经典《玛木特依》，谚语格言《尔比尔吉》，抒情叙事长诗《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大凉山彝族长诗选》《大凉山彝族故事选》《西南少数民族名人录》《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等，参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选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及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冯元蔚曾说：“无论是民间故事、歌谣还是谚语，对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都是最生动、最有效的教材。民间文学的教育、审美作用，是别的文学形式不能替代的。我们应当把民间文学看做当今对青少年教育的最佳课外教材，使它在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冯元蔚积极关注青少年工作，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网吧整治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经验。冯元蔚关心革命老区建设，曾深入革命老区，开展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积极为老区鼓与呼，尽心尽力促进老区发展。

冯元蔚数十年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他一直关注着中国民协的龙头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尤其对四川的“民间文学集成”则更为关心。

冯元蔚连任两届中国民协主席，2001年换届时，他改做名誉主席。2007年，在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活动上，冯元蔚荣获民间文艺最高奖——终生成就奖。

（潘鲁生）

众专家为贵州雷公山节庆文化传承发展献良方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进一步弘扬优秀民族节日文化，深入挖掘贵州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内涵，打造贵州民族节日亮点，中国民协、贵州省文联于7月20日至26日在贵州黔东南举办“我们的节日——香炉山爬坡节暨雷公山节庆文化与‘西江模式’研讨会”调研活动。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带领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参与了活动。

7月21日，专家组来到黔东南州凯里市参与了“我们的节日——香炉山爬坡节”，在香炉山脚下的麻塘村调研了革家传统节日歌舞。

香炉山爬坡节是凯里西郊十余公里处香炉山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方圆数十里的苗、侗、汉等民族同胞都要到此爬坡集会。此外，专家组还调研了板溪村的传统节日——吃新节，并调研了节日的重要活动——斗牛。

7月22日，专家组赴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参与“雷公山节庆文化与‘西江模式’研讨会”。万建中认为，现代旅游不仅仅在于观光，更在于体验，需要和人交流。在这点上，“千户苗寨”这个创意做得比较好，它体现了人文的本质。在机制运作方面，西江苗寨资源变资本，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体现出了社区主体性和村寨主人翁的地位。

作为西江旅游开发一路走来的见证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守永讲述了西江旅游开发碰到的各种艰难。他说，雷山县当初没有把旅游资源集中在县城，反而将更多的资源放在文化丰厚的西江，这体现了旅游开发者的高超发展智慧。

贵州省民协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李天翼认为，门票收益的共享机制、民族文化在旅游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民间传统智慧在景区社会治理的运用等“三大经验”，是西江模式的价值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岳永逸认为，文化的代际传承与代际参与，对西江苗寨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应把苗族文化活态化。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毛巧晖研究员认为，在旅游开发中，西江苗寨的“寨头”“古歌”“歌师”等文化符号需要保护，旅游开发要注意普通游客的需求。

座谈会上，专家们就西江苗寨在内的雷公山节日文化、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7月23日，专家组赴镇远调研舞阳河水上节日文化。在镇远古城东面的河畔，有一座小小的中和山，这座山以著名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青龙洞”而出名。每年的端午龙舟赛，都是从青龙洞开始的。比赛前，人们要在青龙洞举行盛大的“祭龙”仪式，以恭请“龙神”的到来。镇远的赛龙舟活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月24日，专家组赴锦屏县隆里古镇调研花脸龙节日文化。隆里民间花脸龙自北宋以来，已有1000余年历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明代屯军时由隆里先民带入隆里，清代臻于成熟。古往今来，年年如此，从不间断。所以，隆里乡被誉为“花脸龙”的故乡。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举办大型群众性花脸龙灯表演娱乐活动。花脸龙多时有12条，少时也有5条，平时一般由赤、白、黑、黄各2条龙，一共8条龙组成，城中每个门各出龙2条。每条花脸龙连龙头共有13节，“龙头”当然就是赵匡胤，末一节就象征蓝季子，其龙灯制作精巧，鲜艳美观，风格独特。

7月25日，专家组赴三都水族自治县坝辉村调研水族传统节日。水族最重大的传统民族节日是端节。端节在水历年终岁首两端时段欢度，以亥日为主线推算日期欢度。过节批次，古代分为9批，现在分为7批。首批从都匀开始，末批在三都县兰领寨结束，首尾历时50余天。端节是世界历时最长、批次最多、特色浓郁的传统民族年节。

经过近一周的调研，专家们为贵州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所深深折服。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是贵州最为珍视的“宝贝”，将这些“宝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在贵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意义重大。

(潘玉)

“砖雕艺术中青年人才高研班”圆满结业

7月26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和中国文联人事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中国民协主办，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甘肃省民协、临夏州文联、临夏州民协联合承办的“中国砖雕艺术中青年人才高级研修班”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圆满结业。

中国政协副主席索南多杰，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教育培训处处长朱芹勤，临夏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韩学刚，临夏州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马向真出席了结业仪式，结业仪式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任徐岫鹃主持。

索南多杰在结业仪式上进行总结讲话。他表示，此次研修班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中国文联关于全国新文艺群体民间文艺家政治和专业培训计划的指示精神而举办的，也是中国民协力争培养一批优秀砖雕人才，推动新时代中国民间砖雕艺术发展，增强创新动力的重要举措。

结业仪式上，两位学员代表和大家分享培训期间的收获和感悟。来自甘肃省临夏神韵砖雕公司的杨志磊说：“‘志合者，不为山海为远’，很荣幸通过此次高研班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大家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努力创作出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砖雕作品。”来自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的和平表示：“经过课堂和现场的培训讨论，大家的业务水平得以提高，避免了见木不见林的片面性，学会立足于整体性、系统性进行思考。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将把此次所学理论同自己的砖雕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学而思，思而信，信而行。”

本次培训招收了来自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3位优秀的砖雕艺术从业者。培训期间，不仅安排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讲座，还实地考察八坊十三巷的建筑砖雕艺术，现场观摩“甘肃省砖雕技艺大奖赛”，并赴“临夏神韵砖雕公司”“临夏青韵砖雕公司”等有代表性的砖雕厂进行调研。同时，还将大家的作品集中起来，举办了学员作品交流展，为学员们的相互交流搭建了平台。

（裴诗贇）

· 国际信息 ·

◆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暑校活动举办

7月13日，由美国民俗学会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国际暑期研讨班在中山大学顺利召开。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教授和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 Jessica A. Turner 统筹、策划该暑期班，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陈熙老师负责沟通协调，确保了该项目顺利进行。朝戈金、康保成、刘晓春、王霄冰、Michelle L. Stefano、Tyrie Smith、Patricia Ann Hardwick 等7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担任暑期班教员，并遴选出7位国内外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学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叶涛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Jason Baird Jackson 教授、印第安纳大学客座研究员张丽君女士应邀参加暑校活动。

7月13日上午，暑校开幕式如期举行。朝戈金教授、Turner 教授、叶涛教授分别致辞，回顾了中美民俗学12年来的学术交流和友谊，感谢中美两国民俗学者为民俗学的学术合作交流和学科发展建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国际暑校是中美民俗学学术交流的平台之一，为两国之间的学术研究对话搭建了平台，同时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宋俊华教授向暑校师生介绍了民俗学在中山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山大学与美国民俗学合作交流的历程，以及中山大学非遗学科建设开拓性的探索经历，并对青年学子寄予厚望。随后，朝戈金教授给学员授课。他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能力建设的历程，指出非遗保护能力建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2011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从国家层面加强非遗保护能力建设。

7月13日下午，王霄冰教授和 Patricia Hardwick 教授分别给学员授课。王霄冰针对非遗项目或传统技艺生产的产品市场化和工业化问题，认为非遗保护如果不能给传承群体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就不能维持其传承的动力，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保证社区与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Patricia Hardwick 介绍了马来西亚玛蓉舞成为非遗的由来。7月14日，教员和学员参观考察了广州的代表性宗祠陈家祠、南越王墓以及广彩工作室。7月15日至16日，学员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聆听、学习、参与讨论非遗保护能力建设的相关议题。7月17日，康保成教授、Tyrie Smith、刘晓春

教授分别给学员授课。康保成介绍了中国的古戏台，从宫廷戏台、王府戏台、会馆戏台到神庙戏台、私家庭园戏台、衙署戏台，给学员呈现了异常丰富的戏台盛宴。Tyrie Smith介绍了狐火博物馆成立的历史。刘晓春介绍了广州番禺沙湾的非遗项目——飘色，员岗、沙湾、潭山三个村都有飘色的传统。7月18日，教员和学员对番禺沙湾古镇和沙湾飘色技艺进行文化考察。考察团队与飘色技艺传承人进行了座谈，大家就飘色技艺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7月19日下午，暑校举行闭幕式。Turner教授和宋俊华教授分别致辞，庆祝暑校顺利闭幕。在为期7天紧张而热烈的学习过程中，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对话，通过田野实践也使很多疑惑得到了解答，收获颇丰。中美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拘小节的人格风范值得后辈学习。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发展，我们相信未来中美民俗学的合作交流将会在前期合作基础上更进一步。

(来源：非遗科学共同体，辑录：陈婷婷)

◆ 中国“匠人精神”传誉马耳他

7月2日至31日，名为“匠心匠艺——中国传统工艺精品”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展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办。展览为期一个月，展出4位中国工艺美术师近年来的28件精品力作，涵盖花丝镶嵌、雕漆、瓷器、紫砂等工艺。展览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分享当代手工艺作品中所蕴涵的“匠人精神”。

马耳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委员会协调人兼秘书说，马耳他2017年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新近成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委员会，以加强马耳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利用。她表示，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模范，此次中国传统手工艺精品展的举办，对于两国非遗合作特别是手工艺传承，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马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此次展览在呈现中国手工艺之美的同时，也希望能和马耳他业界探讨传统技艺传承，分享当代工艺创作的工匠精神。

(来源：新华网英文版)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7/03/c_138193471.htm，翻译：陈婷婷)

◆ 第 43 届世遗大会 “中国元素” 成亮点

7 月 10 日，第 4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下帷幕。本次大会共审议 35 项申报，其中 29 项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29 个遗产项目中，欧洲和北美地区有 15 项，亚太地区 10 项，阿拉伯地区 2 项，非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有 1 项。

在此次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元素成为一大亮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会上先后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 55 处，位居世界第一。

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世界遗产的数量已达到 1121 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自觉投身到世界遗产保护的行动中去。然而，世界遗产保护依然面临各种挑战，人类活动、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不断带来威胁，各国、各地区遗产保护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53 个濒危世界遗产需要人们更多的保护行动。

世界遗产的意义超越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身。列入的目的是唤起缔约国保护的责任，提高公众参与意识。世界遗产保护显示出特殊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保护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责任。

（来源：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7/11/c_1124736668.htm，辑录：

陈婷婷）

◆ 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庆祝成立 104 周年

7 月 15 日，美国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The West Virginia Folklore Society）庆祝成立 104 周年。1915 年 7 月 15 日，来自西弗吉尼亚大学的 John Harrington Cox 和 Robert Allan 以及来自费尔蒙特州立大学的 Walter Barnes 在摩根敦成立了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

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是美国最早的民俗团体之一，起初它只活跃了短短 2 年，但在这 2 年中，该学会积极搜集传统民谣、歌曲，这些成果后来刊布在 John Harrington Cox 的经典著作《南部民歌》（Folk-Songs of the South）中。

1950年，来自西弗吉尼亚大学的Walter Barnes和Patrick Gainer以及来自费尔蒙特州立大学的Ruth Ann Musick重新振兴了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Barnes创立了该学会的会刊《西弗吉尼亚民俗》，Musick担任该刊主编直到1967年。

在后来的时间里，西弗吉尼亚学会的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西弗吉尼亚民俗》每年由费尔蒙特州立大学出版，直到1980年。1993年，该刊更名为《传统：一本关于西弗吉尼亚民间文化和教育意识的刊物》（Traditions: A Journal of West Virginia Folk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Awareness）后重新发行。1998年，西弗吉尼亚民俗学会并入费尔蒙特州立大学的西弗吉尼亚民俗中心，其原有档案也移入该中心保存。

（来源：

<https://www.wvpublic.org/post/july-15-1915-west-virginia-folklore-society-founded-morgantown>，翻译：陈婷婷）